

年

卷

期

2

2

第

第

民 憲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短評四則

(一) 日本有最近投降的可能嗎

(二) 在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

(三) 所謂政治結社法

(四) 談英格蘭人

民主政治與人性問題

民有民治與民享

中英關係的探討

抗戰最後階段中吾國必需之現代將校

國際外匯基金組織基本原則

法國的政黨與抗敵團體

緬甸的普選

美國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性質

雲孫隨筆四則及其他

舜 生

舜 生

海 濤

景 陶

陳啟天

余家菊

張似旅

孫寶毅

瓦斯克連
斯基教授

沈頌芳

張禮千

孫寶毅譯

陶元珍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出 版

藏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匯通銀行

實收資本叁仟萬圓
經理商業一切

資力雄厚
信用卓著
作用穩健
服務週到

行址：民族路一〇二號
電話：四一八八七

長江實業銀行

實收資本叁千萬元

竭誠為社會服務
扶助工商生產事業

重慶分行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41458
掛號電報：6060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 成都 自貢 瀘州 宜賓 萬縣 涪陵 忠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開縣 雲陽 奉節 巫山 開縣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辦理商業一切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建國銀行

地址：民族路二號 電話：四一五六二

電報掛號：五二一六

日本有最近投降的可能嗎？

齊生

最近日本和平攻勢的風傳甚囂塵上，甚至已引起盟方多少的注意，其實這是值得注意的。

誠然，德意如此結局，不能不令日本感到職心寒；就勉強撐支下去，其結果也還是失敗，這在顯而易見的情況下，日本人也未嘗不明白；可是日本決不會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就無條件的屈服，却是鐵一樣的事實。

第一、日本是一個自負心很強的民族，在她的歷史上有着一串的所謂「赫赫武功」，一種不可敗不能敗的虛驕之氣，實在對於她還有相當的支持力量。

第二、她覺得她作戰的本錢，不僅不遜意大利所能望其項背，就是德意也還趕不上她，現在陸軍還沒有開始大規模的決戰，海軍至少還保留了半數以上，飛機增產的機構也還有大部不曾毀滅，就這樣便拱手讓人，這是她的自負心所不許的。

第三、日本所佔的土地太廣，兵力太分，這是對於作戰非常不利的，但她現在已經覺得了，因此在作風上也逐漸在改變，例如最近仰光的敗退，未經強烈的抵抗，便多少含有保全實力縮短戰線的意味，她可能假定：如果將兵力集中使用，她還是可以多應戰幾時的。

第四、日本可能把美英蘇間的矛盾估計得很高，他們覺得三強在歐洲的盾似複雜而實小，三強在亞洲的盾似單純而

實大，實言之，他們以為美英蘇在歐洲的衝突沒有妥協的可能，美英蘇在遠東的衝突，則終難於避免，因此，他們覺得只要把戰爭拖得越長，他們可運用的機會便越多，死中求活，不見得是不可能的。

第五、她也可能把中國內部的團結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她以為所謂國共間的政治解決畢竟不可能，不待抗戰完畢，也許中國即將發生內戰。中國的內戰一旦爆發，她覺得不是消極的使英美的援華熱漸漸冷淡，便是積極的使盟方的矛盾更趨尖銳，這兩者只要有一項成爲事實，都是於她有利的，因此她更覺得非多掙幾時不可。

第六、日本的對華侵略，本來是日本的軍閥所發起所領導的，可是戰爭的延續到了現階段，乃成了他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存亡問題，因此戰爭的性質也起了變化，換言之，前幾年是日本的軍閥操着人民戰，現在却是日本的人民逼着軍閥不能不戰，日本一部分的軍閥財閥可能有提早投降的希望，但日本人民對於亡國的恐怖却可能更趨團結以支持軍閥財閥，實際即逼着軍閥財閥，使他們難想結束戰爭而不可。

第七、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認爲只是日本片面的幻想，或者只是她主觀上的希望，不會成爲事實的。但是一個人到了將死未死之際，幻想是特別多的，只要她的幻想不全部消滅，她總還想在死神的家中苦苦掙扎。因此，我們覺得國內外一部分對戰爭漸感厭倦，在今天而希望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人們，不是由於精神上的鬆動，便是由於認識的不足。中國的兵家有言，「攻

心爲上」，我們今天不單只應該從軍事上加倍努力，以擊潰日本海陸軍的主力，我們更應該從外交與政治上多想辦法，以消滅日本的一切幻想！否則戰爭還是可能延長的。

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 舟生

國民黨的六全大會，在五月十七日，對於國共問題作了一項重要決議，其原文要點如下：

「大會聽取中央關於中共問題之總報告，深以中央以往所採政治解決之方針爲適當。本黨領導全國軍民艱苦抗戰，無時不盡力於團結禦侮，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共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亦曾有四項諾言之宣告。……現值國民大會召開在邇，本黨實施憲政遷政於民之初願，不久當可實現。爲鞏固國家之統一，確保勝利之果實，中央自應本此一貫方針，繼續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之道。所願中共黨員亦能懷於民國締造原非易事，抗戰勝利猶待爭取，共體時艱，實踐宿諾，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

我們覺得單就這個決議的內容與文字論，國民黨目前所持的態度是很妥當的。中共過去提議請國民政府召集一由各黨派及無黨派的領袖人士所組成的會議，就當前一切重大問題作根本的協商，這與國民黨所主張的「政治解決」，以及所謂「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其精神原屬一致。

今日中國的國民，因爲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實在是創鉅痛深，對於因國共兩方的爭執而可能發生的內戰，確實絕對的無法附和，不問內戰的發起屬於那一方，也不問其根據何種理由

或口實，只要內戰不幸一旦成爲事實，在一般國民觀之，實在就是「妨礙抗戰，危害國家」，同時也會使得八年艱苦抗戰的結果，而不能「確保勝利之果實」。

蔣主席最初提出「政治解決」四字，在一般國民的了解，所謂「政治解決」，就是不用「武力解決」的意思，大家實在是真心贊成。最近延安方面，發表了毛澤東先生一篇在他們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裏面也說到只要國民黨當局同意民主改革，他們還是願意「恢復談判」的。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兩方面都了解到自身對國家，對人民，乃至對國際所負的責任過於重大，並沒有那個願意把談判之門就輕輕的關閉起來，這可以說是解決這個問題所剩下的唯一希望！

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是這個談判如何恢復？何時恢復？關於第一點，我們覺得最好是由國民政府自動的正式召集前項會議。（要避免那種不必要的非正式談話）關於第二點，我們覺得在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以前，即須開始談判，不僅開始而已，並且要談判一個確實的結果出來。假如不這樣做，我們相信不僅國民大會不會開得圓滿，甚至連第四屆的國民參政會也不會開得圓滿！這是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的嚴重關頭，因此我們不能不坦率誠懇表示我們的意見。

所謂「政治結社法」

海濤

所謂「政治結社法」，人民是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尤其關於政治的集會結社，更是民主精神之所寄托。假定在一個國家以內，人民不能自由集合若干主張相同的人組織政黨，而還要受到種種的限制，則至少從政治的意義去看，這個國家便不是民主

國家。

假定在一個國家以內，事實上已經有了許多黨派，忽然要由在朝黨來一套所謂『政治結社法』加以取締或限制，則所謂『平等』云云，便已根本的不復存在，而所謂民主精神，也就消滅得無影無蹤了！

一個政黨的能否存在，依於它的主張是否正確，或執政的成績是否優良，假定它是正確而又優良，它自然會得着多數人民的擁護，你就不承認它，它還是儼然存在的；否則它會引起人民的厭棄，你就承認它保障它也不相干。人民是一個政黨有無存在價值的最後裁決者，其他的任何辦法都是多餘的。

就退一步說，一定要創立一套所謂政治結社法，請教這一套法又如何創法呢？說一個黨的存在一定要有適當人數嗎？假定一個黨有一萬個黨員的黨派，它能團結得如金石，又能忠於它的主張而努力去奮鬥，你說它不是一個黨，它却可能還是一個大黨。一個黨有一萬黨員的大黨，假如它的內容分散，并看不出它確為主張而奮鬥的行動，則實際它只是一個小黨，若至從另一意義上看它並不存在。說一個政黨一定要擁有相當的活動基金嗎？老實說，在中國這樣一種政治環境，除掉在朝黨有這種方便以外，在野的黨派是不容易取得這種條件，並且也不願意取得這種條件的。說一個黨派的被承認一定要它成立得有相當的年代嗎？這也還是不通的，好比個人，有三十歲而可以建功立業的，也有活到一百歲而毫無建樹的，一個黨派的存在要看它對於國家貢獻的多少，並不在乎它成立年代的長短。老實說，目前中國的黨派間是有相當的糾紛存在着的，要把這些糾紛理出一個頭緒，便只有依據客觀的事實，從事黨派間的平等協商，並依據協商的結果，分工合作為國家去分途努

力。如果說黨派會議是開不得，這種所謂『政治結社法』便要加要不得。假定大家不要而一定要這樣做，則可能的結果不外兩端：其一是弱者顯繼續遭受壓迫，決不願除國家的憲法和普通法規以外，再受這種特別法規的束縛；其一是強者便根本不認理，它有了力量便自己承認自己，並不需要任何別人的承認。不幸果然演成這種事實，則中國黨派間的混亂便會永遠沒有澄清的一天了。我們盼望發動這件事的負責方面，慎重而又慎重。

談英格蘭人

景陶

性格愈相近似的人，愈難互相了解。此一奇異現象的原因，大要由於兩個原則，其一是：知己乃能知人，其另一是：對於人，每注視其異於己者，而忽視其同於己者。基於此理，我們天天與英格蘭人同其呼吸而不自知。我們的大學生中學生日日讀英文，坎特伯利的故事，天路歷程，讀過的國人，實不計其數。由英人著作譯成中文的，如原富，羣學肄言，天演論，穆勒名學，利維坦，人性論，人類悟性論，教育哲學史等，亦難一一數，我們總不覺其有任何特殊影響，其原因即在於彼此相似之處太多，以同及同，故無顯明的知覺。

英格蘭人以冷淡稱：殆由於英倫天氣使然。其實英國人是一個講究約制自身的民族。唯其講約制，所以重「保留」，不肯一洩無餘。此與中國人的軌範正相近似。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所謂「至親無文」；皆在此意。往年筆者在英，常往某舊書店購書，與店主人祇是淡然應接而已。一日聞知子將歸國，店主人空約予隨行前再往一見。如約而往，則殷勤道一

民主政治與人性問題

政治與人性有無關係？如其有關係，則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是專制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呢？我們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首須探究人性究竟如何。關於人性問題，從前的哲學家 and 現代的科學家，如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等，有種種說法，本篇不能詳述，只提出幾個要點，加以討論與說明。

所謂人性，依據現代科學的見地，不外指人類與生而俱有的心理自然傾向而言。這種心理的自然傾向，或簡稱爲「性」或另名爲「本能」。現在「行爲主義心理學家」雖或反對本能的說法，但不能完全否認人類心理確有些自然傾向。如果完全否認人類心理的自然傾向，便無異於否認人性，致人不明人類由生而有的本性了。

在人性問題中，首須略加攷究的，是人性的異同問題。一切人類的天性是相同的，還是相異的？關於這個問題，從來有兩種相反的看法：貴族主義者相信貴族的的天性異於平民，而且高於平民，所以貴族應統治平民，平民應服從貴族。有些種族學家，或種族主義者倡言優等種族的的天性異於劣等種族，而且優於劣等種族，故優等種族應統治劣等種族，劣等種族應服從優等種族。現在科學的優生學家與個性心理學家，如果將其說法推測極端，也為難免使人誤會人性相異。這都屬於一方面的說法。與這相反的看法，則相信人性相同。例如我國先哲說：「性相近」，（孔子）「聖人與我同繫者」，「人皆可以爲舜」，（孟子）「塗之人可以爲禹」，（荀子）「人同此心」

陳啟天

（陸象山）：近代西哲說：「人生而自由平等」（盧梭），「不論何時何地，人類的心理均屬相同，此即所謂心理的一致性。在物質環境影響之下，凡環境的形態大致相同者，則人類心靈上即能產生類似的文化」。《語》哥登真塞文化人類學》以上兩種說法，究以何說爲是？依我看來，人性大體相同，不過不是完全相同，在大同之中，却有些小異。人性的大同點在其本質上，小異點則在其能量上。換句話說，人性的基本傾向是大同的，而其基本傾向的強度則是小異的。如果我們否認人性的大同點，即係承認一切人類不同屬於一類，未免不合科學。反之如果否認人性的小異點，即係否認個性，民族性，與優生學，也未免不合科學。

次須略加攷究的，是人性的善惡問題。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我國先哲對於這個問題有種種說法：（一）孟子的性善說，（二）荀子的性惡說，（三）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四）公孫子所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說，（五）楊雄的性善惡混說，（六）王充、荀悅、韓愈的性三品說，（七）宋儒的性二性，天地之性善，氣質之性惡說。又以自然社會爲善的社會起原說，如我國道家及西洋盧梭等，都與性善說接近。反之，以自然社會爲惡的社會起原說，如我國墨家，法家及西洋霍布士等，都與性惡說接近。以上各說的是非得失，現在不擬逐一詳論。但據現代科學看來，所謂人性，離不了生物學或遺傳學的基礎。從生物學或遺傳學上去看，人性不是全善的，也不是全惡的。如果是全善的

，便不會有所謂惡。如果是全惡的，又便不會有所謂善。所以要在人性上追尋道德的起原固可以，但同時也可在人性上尋出罪惡的起原。這可以說是性善惡混說的根據。不過我們若進一層加以考察，實在不能確切指明人性的某部分是全善，某部分是全惡，而雖然有所分別。換句話說，所謂善惡，每每是依人性在環境中的表現形式與程度如何而定。同是一個人性，表現的形式與程度均當便成爲善，否則便成爲惡。例如同是一個好爭心，表現在禦侮上便成爲善，表現在內戰上便成爲惡了。又例如同是一個好名心，用實至名歸的方法去表現便成爲善，若好名過度，便不免成爲惡。由此說來，可知人性也不是善惡混，而只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已。這種說法，我國先哲雖曾一度提及，然迄今尙少人加以大發揮。現在我們用現代科學加以印證，便覺其十分可信了。又如此看人性，亦頗合於常識。可以說是科學的或常識的人性觀，而不是玄學的或神學的人性觀。玄學的或神學的人性觀或把人性看得過高，又或把人性看得過低，均不大合於人性的真相。而科學的或常識的人性觀則既不把人性看得過高，致誤認爲全善，也不把人性看得過低，致誤認爲全惡。如此，則人伊是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了。

又次須略加研究的，是人性內容問題。人性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什麼？孟子用道德的眼光，指明人性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荀子用現實的眼光，指明「人生而有欲」，「日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安逸，是皆生於人之情性」。孟荀以後的儒家，對於人性的內容問題，多是調和孟荀兩家之說法，沒有什麼新發明，不必詳述。現代心理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一種新的看法，即不論人性的善惡，而只論人性在社會生活中有些什麼自

然傾向，及其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如何。在此種新看法之下，現代心理學家提出「本能」的說法。所謂本能，依照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所說是「不教而能，不先知其目的，而能達到某種目的之動作的才能」。（詳見詹姆士心理學原理）由這種本能 Instinct 構成人性 human nature。故欲知人性的內容如何，則須知人類具有若干種主要本能。詹姆士所說的主要本能，有摹倣、競爭、好鬥、忿怒、同情、「遊戲本能」恐怖、貪得、創造、遊戲、好奇、友愛、嫉忌和親子之愛等。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 McTearall 所說的主要本能則爲逃避、拒絕、好奇、好鬥、自卑、自誇、父母性本能、兩性、集合、貪得、與創造等本能及其相關的情緒。（詳見麥獨孤社會心理學導言）極端行爲主義心理學家雖有否認本能的，但建立行爲主義的華生 Watson，仍說人類具有驚懼、情愛與忿怒的三種基本反應模形，不過將本能的範圍縮至最小耳。又有些心理學家不用本能的名詞，而改稱欲望。例如，托馬斯 Thomas 說人類有四種基本欲望，即安全欲，新知欲，權力欲，與反應欲，或友侶欲。丹拉普以消化欲，排泄欲，休息欲，活動欲，居住欲，愛戀欲，父母欲，名譽欲，從衆欲等爲人類一切行爲的基礎。人類的欲望內容雖多因後天的影響而異，然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具有的欲望，則不能不說是基於先天的人性而來。這種基於人性而來的欲望，也可簡稱爲心。其主要者約如下：（一）好生心，包含生命的保持，兩性的關係與種族的綿延等自然傾向。（二）好利心，包含佔有與貪得等自然傾向。（三）好名心，包含自尊與榮譽等自然傾向。（四）好權心，包含領袖，服從，權力與自由等自然傾向。（五）好爭心，包含競爭與妒忌等自然傾向。（六）好羣心，包含羣居，社交，團結，

同情與愛國等自然傾向。(七)好奇心，包含好奇，探險，求真(哲學與科學)與理性等自然傾向。(八)好樂心，包含遊戲，娛樂，音樂，與藝術等自然傾向。這八種心理的自然傾向，構成整個的人性，至少也構成人性的主要部分。我們要知道人性的全貌，必須發顯這八種心理的自然傾向。如果只注意其中的某一種，而完全忽視其他，則其所謂人性，將偏而不全了。

② 又次須略加研究的，是人性的適應變化與調和問題。我們既知人性係由幾種主要的心理自然傾向構成，那末人生宜如何一面適應人性，一面變化人性，以求其調和發展，實是社會哲學與社會科學上的一個重大問題。人性的各種自然傾向，每每不知不覺的表現為各種要求或欲望。這種基於人性的要求，不能完全抹煞而不加以適應。因此產生各種社會制度。每種社會制度，愈能適應人性，則愈普遍而愈永久。不過完全適應人性的社會制度，自古迄今，尙未完全建立起來。所以需要隨時改進，以求其比較合於人性。又人性的自然傾向，表現於實際生活時，多難免有所偏。這即宋儒所謂「氣質」，也即現代心理學家所謂「個性」。但個性多就偏在好一邊的性質說，故需要發展。氣質則多就偏在壞一邊的性質說，故需要變化。諺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這句話看來，似乎一般的人性以及一個人的個性，均是不易變化的，那末爲什麼要說變化人性，或變化氣質呢？人性或氣質的本質不易變化，是一事實，我們須得承認。不過人性表現的方式與程度，則有種種差異，故就有變化的可能。換句話說，我們所謂變化人性，不是改變人性的本質，而只是改變人性表現的方式與程度而已。又人性中的各種自然傾向，有時不免互相衝突。例如好生心有時與好名心衝突，好利心有時與好羣心衝突，好權心有時與好知

心衝突，好爭心有時與好樂心衝突。這即我國宋儒所謂天理與人欲交戰。依據宋儒的意見，天理是全善的，人欲是全惡的，所以須用天理克服人欲。不過依據現代科學的見地看來，人欲基於人性，只可求其表現合理化，決不能完全取消人欲，而代以純粹的天理。要求人性表現的合理化，則必須調和和性的各種自然傾向，使其不大相衝突。

以上我們已將人性的異同善惡內容適應變化以及調和等問題，說了一個大概。繼此再略說人性與政治的關係。關於人性與政治的關係，可從兩方面加以說明：第一從人性方面說，人類需要政治。所以自古迄今，無論何時，何地，都有政治的組織。所以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人類以外的動物沒有政治，只有人類才是政治的動物。人所以是政治的動物，即由於人性本具有政治的要求。雖有少數理想家反對政治，主張無政府，但從來不能實現。將來也未必能實現。其所以不能實現的主要理由，乃由於政治可以大滿足人類的好生心，好名心，好權心和好羣心等人性。如無政治，則此等人性便無由大大滿足了。在事實上，雖有人不問政治，甚至逃避政治，但仍不能絕對不問政治，也不能絕對逃避政治。如果絕對不問政治，或絕對逃避政治，必係由於實際政治的病態過於深沉，而激成一種人性的畸形表現。其實，人性實不樂有此種畸形表現。此種畸形表現一經達到極點，則必有政治革命隨之而起。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性有政治的要求。一切反對政治和逃避政治的說法，不過暴露實際政治不大合於人性的要求而已。第二、從政治方面說，政治就是人性的一種表現。所以政治現象可在人性上尋根源，即可用心理去解釋。用人性或心理解釋政治現象的說法，從來即已有之。不過專從

人性或心理的觀點以討究政治現象的著作，則至近代始漸有之。一八七二年白芝浩 *Baird* 發表的物理與政治 *Physics and Politics* 論文，首先指明專制本能在政治生活中所佔的地位。近數十年來的社會心理學家以及心理的社會學家多曾用各種心理的觀點討論政治現象，詳見各家專著中，本篇不能詳述。至於政治心理學的專書，則有華勒斯 *Wallas* 的政治中之人性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值得我們一讀。總之，政治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可用人性的各種自然傾向或各種心理因素加以解釋，這不但從前的哲學家有此種說法，即現代的科學家也有此種說法，故我們必須加以相當的承認。

政治既與人性有相當的密切關係，那末可再進而討論究竟何種政治比較合於人性。關於政治的方式，古今中外雖有多種，但大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政治主權屬於少數特權階級的專制政治，如神主政治，族主政治，君主政治，軍主政治與黨主政治等，均可歸入此一大類；第二大類為政治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之民主政治，如直接民主政治與間接民主政治等均可歸入此一大類。關於此兩大類政治在本質上的分別，另詳論民主憲政論第五章，（商務印書館出版）本篇不擬再贅，只專論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突為專制政治，抑為民主政治。

我們要知道比較合於人性的政治是何種，只須看看人性在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下的表現如何。人性雖為先天的自然傾向，但其表現的方式與程度，常因環境不同而發生許多差異。對於人性表現有影響的環境，有自然環境，又有社會環境，本篇不能詳論。現在只說明一點，即政治環境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環境，對於人性表現具有廣泛的影響。其影響不但關涉多數人，而且滲透各方面，我們必須予以注意。要人性有健全之表現，

必須先有健全的政治環境。民主的政治環境，比較專制的政治環境健全，所以人性在民主政治下的表現，比較專制政治下的表現為健全。我們要證明此種道理，自須分別考察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下的人性表現如何健全與不健全。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般人性有八種主要的心理自然傾向。此八種自然傾向，必須都得到適度的調和發展，始為健全的表现，否則便為不健全的表现。現在試先說明專制政治下的人性表現如何不健全。原來一切專制政治，無論其形式為神主政治，或族主政治，或君主政治，或軍主政治，或黨主政治，都不外是一種階級統治，即由少數特權階級統治多數無權的人民。在此種政治之下，特權階級與一般人民的人性表現，顯然為兩個極端，而各成一種畸形。例如好生心，在特權階級則常有軍警與間諜，自以為獲得極度的安全感，而在一般人民，則常在軍警與間諜威脅之下，感到極度的恐怖。因此特權階級的好生心便不免發展過度，至於「宰獸而食人」。而一般人民的好生心，則得不到人生所必要的發展，只能飲恨吞聲，苟且偷生。「一則過於「縱生」，還想求「長生」；一則過於「迫生」，深感不如「無生」。（按迫生不如無生，語本莊子，意謂在專制政治的恐怖之下，勉強偷生，實無樂生之心，故不如無生。）這都是好生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的好利心，也常不免發展過度，至以國家為私產，視人民為奴隸，而予取予求，貪得無厭。而人民呢，雖分所應得的利益，與由血汗得來的生活資源，亦常有被特權階級自由奪去的危險。一則惟利是視，越多越好，而不知止；一則仰事俯畜且難為計，尚須以貨賈獻特權階級。這都是好利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每每好過度自尊，而蔑視人民，至於貪天之功，奪人之名，以為

己有，尚不知恥。一切榮譽都歸諸特權階級自己，至尊至貴，莫可與比。而人民呢，則只可含垢忍辱，以求苟全。一則好名過度，不惜肆意掠美。一則不敢近名，只好睡而自乾。這些都是好名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壟斷一切權力，享有絕對自由，其好權力可謂發展到了極點。一般人民既無一點權力，亦無一點自由，惟任特權階級生殺予奪，而不得稍稍伸冤。一則權力無上，為所欲為。一則終身憂辱，束手待斃。這都是好權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內部明爭暗鬥，無時或已，甚至親以及同志亦不免互相傾陷，甚至互相殘殺。而特權階級對於一般人民，則不許其有絲毫爭心，如果一般人民有敢與特權階級相爭者，則「一斃」或「一黨」之禍即隨之而來。因此，使得一般人民不挺而走險，便只有相戒不爭，以求免禍。一則有爭心，只許自己爭，不許他人爭。一則太無爭心，雖理當力爭的，也不敢稍爭。這都是好爭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要集會便集會，要結社便結社，照來攘往，發無一不可從心所欲。但一般人民則不得自由集會，亦不得自由結社。苟自由集會，則小之受警告，大之遭報復。因此，使得一般人民一散即散，無由羣策羣力，以共求社會的進步。然好羣心實出於人的本性，既得不當的發展，如不甘於離羣索居，逃世無聞，便只有走上秘密集會結社之途了。一則可以公開明比為好，一則不得自由與人往還，這都是好羣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常好以自己的主張，為惟一的真理，而不許一般人民有絲毫異議。異議多起於知識，因此特權階級如不採用意見政策，不讓人民有知識，勉強人民信從其主張，而不得自由研究，更不得自由言論。結果，使得人民慮慮故事，不知求知為何事，更不知真理為何物。特權階級不但固陋，自安

於八股式的教條。而多數人民僑於迫害，也只好隨之安於八股式的教條，此之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則有言論出版自由，強不知以為知。一則無言論出版自由，只好「樂子之無知」。這都是好知心的畸形表現。又例如特權階級窮奢極欲，難以忠憂。而一般人民則以特權階級過於窮暴，不勝其愁苦，只能向山林求逍遙，或向風月求安慰，或向酒色求發洩，或向上帝求保佑，或向渾殼求寂滅，甚或向死神求速死。一則太樂，不恤他人痛苦。一則太苦，只好「慰情聊勝無」。這都是好樂心的畸形表現。由上說來，可知人性在專制政治下的表現實在太不健全。特權階級的人性表現太過度，至成為一種畸形。而一般人民的人性表現又太不足，至另成為一種畸形。前種畸形近於瘋狂，甚至就是瘋狂。後種畸形近於癡癡，甚至就是癡癡。瘋狂與癡癡都是精神病。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專制政治之下，無論特權階級或一般人民，都有發瘋精神病。特權階級愈瘋狂，則一般人民愈癡癡。一般人民愈癡癡，則特權階級愈瘋狂。欲治癒此兩種政治的精神病，只有用民主政治代替專制政治，使每個人的人性都能獲得健全表現的機會而已。

在民主政治之下，人性的表現比較健全，也可詳細加以說明。民主政治承認人人俱有生存權，無論何人不得無故迫害他人的生命，也不得非法逮捕拘禁並處罰任何人，更不得有任何秘密機關任意殘害人民。因此在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身體有自由，生命有保障，好生心便可得到適度的發展，不致像專制政治下的人民，時時感受恐怖，更不致像專制下的特權階級，用屠殺同胞的方法來滿足他們自己的好生心。無論當權不當權，皆可和平相處，各遂其生存，這是好生心得到健全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均有職業自由與財產自由權，無論何人

不得以政治上的原因，剝奪人民的職業，侵犯人民的財產，則人民不致因失業或貧困的恐慌，而輕易改變其政治主張。如此，則好利心可用正當的職業與合法的財產予以滿足，而獲得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平等，則人人可以自尊而不必相殘。每個人民只要肯努力，有人格，便可達到社會的贊許。不以欺詐為能，而以正直為榮。不以爵位為貴，而以才能為貴。如此，則好名心可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民有最高無上的主權。如此，則人人可以用投票的方法選擇自己所同意的政府；更可以用投票的方法，或立法的方法，監督自己所不同意的政府；更可以博得民意的方法，自行組織政府。故在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不但有自由，而且有權力；不是特權階級的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人人都有權，而人人亦不得濫用其權，致使害他人。這是好權心得到健全的表現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人均可在法治軌道以內公平競爭。因此則誰有能力，便誰可在政治上顯身手，不致像專制政治要耍陰謀，憑武力，以求取勝；更不致像專制政治濫用政權，完全不許人民從事政治競爭。我們要知完全不許人民從事政治競爭，並不能斷絕競爭，只是驅使人民走出法治軌道以外從事競爭而已。所以民主政治不怕人競爭，只求一切競爭合於法治軌道。如是，則好爭心便可得到健全的表现了。又民主政治承認人民均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因此，則無「黨綱」之禍，而人人有好羣心可因自由集會結社而得到相當的滿足了。又民主政治承認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公器，不容許有特權階級以國家為私產。因此民主

國家的人民易於感覺國家可愛，不惜為國犧牲。這是好羣心中的愛國心也得到健全表现了。又民主政治承認真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此在民主政治之下，人人可以自由提出主張，也可以自由研究學術，更可以自由批評辯駁。經過自由批評辯駁之後，誰的主張可以獲得多數人民的贊同，便由誰執政，並實行其主張。如實行的結果不佳，則須改組政府，另由他人代之。所謂他人，乃指此時獲得多數人民贊同的黨派而言。故民主政治講道理，不講武力；講理性，不講狡詐；重說服，不重武斷；重協商，不重專斷。如是，則好知心便可得到健全的表現了。由上說來，民主政治既可使人的好生心、好利心、好名心、好權心、好爭心、好羣心、和好知心都得到健全的發展，則人生有活氣，有興趣，這便是一種大樂。不必要如專制政治下的人民，只能在苦中尋樂，強自解慰。如此，則好樂心也隨着得到健全的表现了。

總之，政治是為人所設的，必須求其合於人性。一切專制政治都不合於人性，只有民主政治才比較合於人性。我們要人性的表現不流於瘋狂，也不流於癡癩，則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其易於獲得健全的發展。人人精神健全，自然政治易於清明。因為民主政治比較合於人性，所以現代多數國家都趨向於民主政治，而成為一種不可抗的世界潮流。如果還有人迷信專制政治，則不是瘋狂，便是癡癩。我們要治療這兩種政治的精神病，別無特效藥，惟有實行民主政治，使其恢復正常的人性，並獲得健全的表现而已。

民有民治與民享

余家菊

民主爲當今時代大義，隨墨梭里尼與希特勒之倒塌而昌盛，凡知自好者，皆不敢反適之。顧顛倒真理之技巧，早已繁多，不喜民主者，每潛亂民主真義以打擊民主。故開明民主涵義，並非無益之舉。今世民主有所謂政治民主，經濟民主，乃至社會民主；就政治體制言之，英美固爲民主，蘇聯亦稱民主，全民政治固爲民主，階級專政亦稱民主。欲於民主立一正確而涵蓋之定義，殆不可能，竊謂民主之簡要說明，語其完善，仍莫過於民有，民治，民享之三語；民有者，屬於全民也；民治者，決於全民也；民享者，爲彼全民也。故凡謂國家爲某人，或某部份人所有者，非民主真意也；謂國事當決於某人或某部份人者非民主真意也，謂政治乃謀某人或某部份人之滿足者非民主真意也。

或謂國家應爲爭取民主者所有，於彼反民主者，應當擯諸全民之外，持此說者，意在保證民主制度之安全，與夫民主進行之順利，原不可厚非。世間革命黨，爲求革命成功，而賦與革命黨及革命追隨者以特權，名之曰革命民權，亦殆成歷史之公例。然而如是之措施，謂爲一種暫時政略，藉圖局勢之穩定，自屬人情可有之事；謂如是措施，即理性之當然，而定爲經久體制，則實無以自圓其說。蓋民主真髓，在人各有權如其良心所示而發爲主張，不同其與衆相同抑屬相異。使其力果足以震撼人心，而使吾不得不有以箝制之，則必吾之所爲有不盡合宜者在，此正須有人鞭策以資警覺。故民主精神即在容允反對。於民主潮流之下，而胆敢不隨俗苟同，其人必爲豪傑之士而

將成社會之中流砥柱。故國家應爲全民所有，而不問其信仰與主張是否合乎新潮。一有核除，民主主義，即宣告死刑。或謂果如是，則漢奸亦有權過問政治乎？不知漢奸爲國人所唾棄，置之廟堂之上，將扭怩無地自容，稍有人心，何顏更作活動；漢奸爲羣衆所嫉惡，非依人道主義加以保護，羣衆必將拳足交加，立置死地，肉體生命且不保，更何有於政治生命。用法律制裁漢奸，祇是表彰法律的尊嚴而已，非有所畏於漢奸之政治力，故不成爲政治問題。

民有爲虛名，而居虛位。民有能否舉其實，全視民治民享之能否實現。民有實寄寓於民治民享之中，離民治民享即無民有之可言。故民治民享爲實事，而民有爲虛名。雖爲虛名。而爲民治民享之所本。唯其有之，故應治之享之。否認民治民享而擁護特權階級者，必否認民有。其大意不外基於『唯勞得食』之原則，而謂用力取得者始能有之。不知國家之爲物，其所有權有排他性，既經佔有，他人即淪入無權階級，而人之出生於某一國家之內，又爲其本人所莫可如何之事，彼提尼先登者既取國家而獨有之，則彼後來者若不甘心爲無權階級而任人驅佈，則祇有出於打破現狀之途，於是而循環革命起矣，故民有者乃所以杜絕內戰而導國人於和平康樂之境者。

民治之意，爲決於全民。所謂全民者，係指成年而能負擔人生責任者而言。既已成年而負擔人生責任矣，則於對彼有關之利害禍福，自須賦彼以參加決定之權。不然，則稅由彼納，而稅收之用途則不得過問，兵由彼當，命由彼拚，而兵之待遇

如何，命之價值何似，則不得過問；歐騎進擾，血由彼流，苦由彼受，而防禦之措施如何，安全之保證如何，則不得置喙。有權者固見義勇為，自矢以責無旁貸，撥之事實，究何補於流離喪亡。責人以委其生死得失於我之手，信我而任我所為，微論未必能予人以安全福利，藉口能之，所責於人民者毋乃稍嫌太過乎？國民於其身之生死禍福，概不自為控制主宰而一以委之於人，其責任心既趨薄弱，對於國事自必流於淡漠。現代國家煩重艱鉅，非少數英雄聖哲所能支持，必全體國民對於國事共感興趣。各負其責，國事始有振興之望。故國事決議全民，不唯在正義上為當然，而在事勢上亦為必要。反此道而行之，其禍必中於國家，空言責無旁貸，何益於事。

自來反對民治者，莫不以人民知識簡陋，德性低劣，不足以當國事決定之任。國事為國民禍福所關，應由有能者任之。古所謂賢人政治，今所謂專家政治，皆此意也。夫國事之決策，有待於知識之運用，而人民之知識又有高低之不同，是皆確切無可否認者。推哲人政治之用意，非將國事置於天生聰明睿知之聖人之手不可。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固早已作如是之夢想。然而聖人之降生，誰能保證其代代不絕乎？假使某一時期，竟無聖人出生，又將如之何！且聖人者，不能由人自認，須由衆人公認之。假使由人自認，則人非聖賢，誰不自視為聖賢？假使須由衆人公認，衆人既屬無識之徒，何能認識聖賢？認識聖賢者，認識聖賢之主張為是為非也。假使衆人認識聖賢之主張為是為非，則是衆人有評判之力，可以決定國事，選舉賢能矣。民治所要求者，不過如是，是其所言何異以反對民治始而以贊成民治終！

實施民治不憂人民知識不足，德性不充，其故亦可得而言

第一，國事須訴諸人民者，乃國事之方針，而非施行之技術。方針者，政策也。政策關涉於人民之禍福利害。人民縱無知，於其自身之利害終能知之。其禍福利害之遠近不切身者似非人民所能關切或辨識，實則但須准許民間有識者得自由發展其異於官吏主張之見解，以訴訟辯爭於人民之前，人民所取雙方議論，自可施行裁判決擇於其間。故人民無須具有創設設計之能力，而但須具有鑑別之能力。欲人民正確發揮其能力，但須政府報告確實，而民間又有批評之自由，則人民即優為之。批判不自由，固為民治之致命傷，而報告不確實，亦為民治之大禁。報告不確實，即為欺騙民衆，其罪等於舊日之欺君，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但須官吏不欺騙，民衆即能發揮其聰明，有兼顧民衆者，人人有檢舉糾正之責任；一經檢舉，即為衆所共棄。忠人民與忠國家，同等重要。

其次，民治之德性，自亦多端，如奉公守法，每人自制，統皆屬之。然而語其根本，則在對於國事，各秉其良知，以主張其自身之所願主張。民治之最大罪惡在強人棄其所信以從我，依據民主原則，欲人棄其所見而從我，其道難能出之以說服，不得強之以恐嚇。用恐嚇以強人放棄其所見，是為民治下之大逆不道，足以摧毀民治之根柢。夫人民既有所見，誰不願公開於世，以求有所助益於國事，徵論人豈有利人之心，即就表現自己之動機言之，既有所見亦不甘自行珍祿而不以示人。人之所以不肯公表其主張者，因公開其主張即有危險隨後也。人之所以不肯自作主張而必追隨潮流者，因為自作主張即有蹂躪隨其後也。故欲人民具備民治之根本德性，其事不難，要在解除其言論之恐怖耳。能如是，則民間氣象，自然開明活潑，而和平相處，自然可能，蓋人人既處於積極有為，一切猜疑嫉忌

之情，自大必滅。民治氣象，即坦白氣象，即有為氣象。凡沉，陰鬱，傾軋等病態，皆專制時代之流行病。理其野，而知其政，並非虛語。

民治德性之要件，其又一種為服膺理性。民治之發展，本在理性得勢以後，在西洋中古時代，一切建立於權威信仰之上。善惡是非之判斷，一切唯權威之馬首是瞻；而獨己良心無所施其力。權威之所是，良心不得非之，權威之所非，良心不得是之。權威依仗之表現於政治，則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凡帝王所言，無一而非「聖旨」；臣民祇當服從，不得批判。積至今日，於官吏所言，而有非難，即是忤逆，搗亂。至少亦認為故意與官吏下不去。民治時代，人人自尊，各依其良心為判斷。又人人自卑，真知自己非全智之神，於真理不能窺見其全面，故於其所偏執而他人非難，不覺有何恥辱之可言，樂於接受他人之所見。國人正因不知此理，不唯受人非難者不具容納雅量，即反於人者亦必展轉曲折，多方顧全受非難者之面子；其不欲抑先揚，起而頌揚一番，再徐徐導幾句。是為立著技巧之所在。其實虛飾之氣，阿諛之態，兩在可恥，欲樹立民治，則服膺理性，善善從長之風，不可不加發揚。

民享者，政治設施係為人民而有，政府存在係為人民而起。政治是公眾的事，亦是謀求公眾福利之事。政府是人民生存之工具，而非生存之目的。人民至上，而政府並無神聖可言。政府存在之充實理由，在為人民謀求福利。官吏之設置，非所以使其騁恣於人民之上。官吏而不忠於人民，即失其官吏之存在理由。人民固當出粟米麻絲血汗生命以供養官吏，然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官吏不但應解除人民痛苦，而且應增益人民之福利。「民為貴，政府次之，官為輕」。人民尊重官吏

。乃尊重其為聖人。究之，正當的人生，皆有所服務於國家社會，官吏並無特殊可尊之處。至有豐功偉烈之人，其受人尊敬，乃基於其豐功偉烈而然，非由於其為官吏而然。重官輕民之觀念不除，則民享政治無從樹立。欲去「官國」之恥，必先知官者乃所以服務於人民者也。

如何增進人民之福，是為實際政策問題，非今茲所宜討論，然而文明人類必然承認人人生而有生存之權，否則胎胎不為罪矣，棄嬰不為罪矣。人人有生存之權，有能有力者，其生存以貢獻其能力於人羣為條件，寄生的生存非吾人理性之所許，其凌虐他人剝削他人以謀生存者，一面為吾人之正義感所不容，一面為吾人之間情心所不允。至於用公職以敲詐人民，則直是一種刑事犯，而為文明之羞，宜據諸文明社會之外。彼老弱殘廢之人，力不能自存，吾人當發憐憫之心，尊重其生存權，而保證其免於匱乏之自由，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人者，即在其由於力之崇拜而轉為理之崇拜與愛之崇拜。假使唯有力者始得生存，則吾人其去禽獸不遠矣。

在政治上，從來有富國富民之爭，民既富矣，稅源充足，國庫何患不裕？此富國論者之財政理論根據，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人民若貧，則志氣萎靡，意氣卑隨，道途低薄，不至於整頓文明毀滅而中止。至於營養不良，體質衰弱，貧弱民族即有滅種之可能。至於持富國論者，其目的無非在供應國庫之支付。試問國庫支付之目的究安在乎？亦唯曰強兵而已耳。姑置強兵之目的應在養民於不餓，國家盡奪人民之所有而以其養兵，無他國不能興，而兵亦必弱，蓋兵亦來自民間，民間疾苦，兵必無鬥志；兵無鬥志，國何能興？此歷代老成人所以對於富國論鳴鼓而攻之也。

民主主義，人各異辭；滔滔皆是，誰與是正。而民有，民治，民享，究為通行之界說。故據以疏釋民主主義，或於觀念之警正，不無小補焉。語有之：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生於其事，害於其政。觀念齟齬，殆亦不可無也。

中英關係的探討

張似旅

如果中英兩國，欲將聯合國的精神化為建設性的動作，以樹立遠東長久的和平，則中英兩個國家應具有勇氣與果斷，在應戰爭需要所產生的環境下，擇一適合的時間，將此一向保持靜默的問題，作一直接與開誠的檢討。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正式加入世界大戰，消除了中國對英國過去十年來遠東政策的迷惑，但是欲保持戰時同盟的關係，仍能繼續於和平時代，兩國間的關係尚有不少可以檢討的，在可能的範圍內，為避免將來的誤會與衝突，太平洋戰爭所引起的重要問題，最好在戰事未曾停止以前，彼此獲得相當的諒解。

我們要問：英國過去在遠東的政策是怎麼樣？英國遠東傳統的政策，在南太平洋方面，是要獲得殖民地的鞏固。在北太平洋方面，是要維持均勢的政策。在得了法荷兩國諒解與優勢海權的條件下，他在南太平洋操縱一切，在北太平洋一帶情形就較為複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後，他藉英日同盟與擁護美國的開放門戶政策，維持他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九一八事變後，俄國暫時退入西伯利亞，給予日本壓倒的優勢，英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地位，顯然的從北方不衡發展的勢力，不獨影響他在中國的權利，而且威嚇他南太平洋的帝國，在這個情況下，他只有和日本妥協談判，或是援助中國的選擇，他兩方面都試過，但是未曾對任何方面，有堅決的推進，由于他的猶豫，妥協，卒不趨於被動的地位，十年來，英國政策模稜兩可，似乎他在做一種意願中的幻想，——一個能保全國家完整，而不強的中國，和一個可能滿足而野心壓得住的日本，——在東

方巨大的動盪中，似乎他還想享受從前安逸的日子，逃避應得的災難。

避免與日本戰爭的政策，已經失敗，英國忽然發覺他與中國并肩作戰，他對中國的奮鬥，雖然有極大的好意，但是欲和中國作一盟國，尚須先打破腦海中的像一層厚牆般的歷史成見，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一個半殖民地的民族，共同作戰，並對抗共同的敵人，在歷史上係帶有滑稽性的一件事。所以在擊潰日本以外，兩個國家應作極大的努力，來取得作戰目標的融合，兩個國家應該在永久廢除日本武裝在施行不能讓步的殖民政策，和真實改造中英關係的原則上，建造亞洲的新平衡。

太平洋的戰爭，並不是完全起於日本的侵略，從人類的進步和自由的歷史觀點，日本的野蠻，是自從二十世紀起東方帝國主義制度歷史注進改進運動過程中，最暴烈的一階段。假定沒有日本的軍國主義，一切陶鑄和造成東方民族命運的力量，亦會在另一種形態而同樣有力的伸張起來。日本冒稱為東方民族自由的鬥士，虛偽，已經被他本身的野心刺破，國際的驅逐，自應受公義的疏決，但其所冒充的不易信條，必繼續和有力的存在。在槍林彈雨中，自由之聲，恰巧的發自統治的國家，不斷的進入千萬萬東方民族的耳朵裏，在這個鬥爭結束後，這些民族將不肯承認任何色族的武裝解放者，而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任何代價，都不能恢復逆時代潮流的戰前狀態。因為中國是第一個從流血鬥爭裏得到完全自由的國家，其他的東方民族，對中國自然有一種欽羨，雖然為了建設的大業，中國不能亦

不願秀動的參加國境以外的事情，但是因爲在東方，中國是國際合作與民主理想之堡壘，故對於戰後殖民民族命運，萬難無動痛癢。而且散佈在南太平洋一帶有一百六百萬左右的中國籍的居民，這大量僑胞的地位與福利，永久是中國政府最注意的一件事，戰後一切關於殖民地的決定，主要的還是免不了幾乎英國，但是關於大東亞的處理，如若缺少了中國的合作與贊助，亦會引起不幸的誤會。

在這一個區域內英國有雙重的職務，因爲他是歐陸外帝國主義制度的主要建築師，所以他是南太平洋各民族的主人翁，因爲他是反抗強盜的領導者，所以他同時亦是這些民族的武裝保護者，既然這一次戰爭最神聖的目標是擊碎一個自稱優秀民族統宰其他民族的邪說，苟欲繼續戰爭以前英國統治亞洲的制度，自然應受嚴格的檢討。這樣的說法，並非全無條件的責備英國以前殖民地的制度，在討論英國人一向與有色種民族的關係，我們要分別英國人自身優越的態度與英國行政的方法，隨便的斥責英國殖民地統治殘暴與傷害土人利益，是偏乎成見的斷語。反之，英人自稱其行動爲被統治者之利益而統治，是一種偽善的宣傳，事實或許是在兩個極端的中間，而其混合的程度，因地因時，各有不同，在我們中國的眼光來看，很難相信，這一次的戰爭，日本是單靠武裝優勢而能戰勝在緬甸，馬來亞，百年來根深蒂固的英國，在南太平洋戰事開始前後，土人誠懇之態度，甚至引致的行動，是一個敦促英國勝利之後，應厲行改革殖民地政策的最有力的辨證，在未來進步的時代，應以機務與誠實來代替從前慘敗的教訓。

在這些地域中國自然不能本回歸戰前狀況的原則來與英國合作，但是中國亦並不是願意的，或希望英國自願的，或被迫

的，——事實上不可能——退出這些地方，地理的拘束，天然的環境，和自治獨立的條件，在事實上並在相當時期內需要英國力量，留在南洋一帶，在那廣闊的海洋中，非有海軍的力量，就無法防禦侵略，與海盜的掠奪。此外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問題，在國際安全負責權力指揮下，在南洋一帶，並在規定時期內，英國是施行武裝警察責任最合適的國家。在戰後經濟的建設，英國的財富技術，和其三百年來與非歐洲民族往來之豐富經驗，亦未可言非：東亞和平之主要條件，除了擊潰並防止日本軍閥正起外，就是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及其殖民地關係的調整。如果英國真正的欲建立久遠的和平，就應將從前殖民地爲統治者之特別市場與原料儲藏庫的觀念，換作一個認殖民地是一種歷史信託，無論其大小或單獨或聯合，都是預備完全獨立的單位的新觀念。在新的世界秩序，老式的殖民地帝國是一個反常的制度；開羅會議，已經宣佈，應許朝鮮在可能的時間內予以獨立，我們推想國際時勢的演變，在朝鮮初期脫離日本的羈絆，可能的暫時接受東方國際性的行政機構保護，同時在友邦援助下，立刻實施社會與教育建設程序，以提高人民程度，至能達到負起獨立的責任，英國亦應同樣的給予南太平洋被統治民族以相等的待遇。英國如果考慮得透切，就應該明白爲着了不能消除的上一代社會的色族與心理的成見，凡非白種人所殖種的英屬土地，始終不能成爲共和帝國（British Commonwealth）的自然份子——雖然這個政體內的份子，是絕對自尊與自由的——這些地域，必有一日要脫離英國的，在戰事快完或初完的時候，英國就應該宣佈放棄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來表明和平政治的風度，在這裏我們要很顯明的指出，放棄所有權並不是立刻退出這些地方，或立刻讓出管理權，退出與

讓權是逐步演進的，演進的方式程序以下再討論，一個久遠和平的世界，需要強有力的國家，以征服的手段，佔領別個民族的土地，而首為和平與人權而放棄的實證。

戰後的英國，對於南太平洋一帶的地域，應以家長的地位自居，依照美洲初年獨立的模型，在英國的領導與保護下南太平洋羣島，可組成一個聯邦，並在公佈的若干年後，（如美國對菲島的議決案）完全予以獨立。在訓政的時間內廣大的教育與社會建設計劃，用長期借外債的方式，由英國的技術與資本來援助其實現。在過去一百年來，英國殖民地管理的積習，是每一個直屬倫敦內閣殖民部的殖民地政府各自為政，除了維持地方秩序和司法以外，對於提高人民程度的水準的工作，只是在預算內的小數內取一少部份來敷衍，同時英國私人的資本家與企業家盡量開拓與發財。以後管理的制度應建立在人類順序進步的原則上統籌辦理，由政府發動與實施社會建設的計劃，對於以前英國私人的一切投資，應先由政府代表殖民地的民衆負責收買與賠償損失，以後的私人企業，應在給予本地人民有過半數的管理權的條件下，方能許可成立。南太平洋的天然資源，應在合法的國際分配辦法內開發。而不是單為帝國圈子裏的僑先享受來開發，南洋土地的高興與財源的豐富無量，如異土人的利益是整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基礎，則不難在相當的時間內，將殖民地民族為各種建設所担负的龐大債務清償。住在各該地的中國人民，入境後有固定的住所與職務，獲得平等的義務與責任，從前藉口保護土人利益與僑民的苛例，與不成文的歧視，更應完全停止。惟有毅然發揮新的精神，和採用國家輔導推進的社會建設程序，方能把這一次大戰的犧牲變為長久和平的具體貢獻。如果這樣的做法，南洋羣島的民

衆，對英國一定有真正的崇敬和深重的感激，我敢說，這種誠實無疑的會受中國政府讚許，亦可能得到自行選擇居留各該地方數百萬僑胞的忠心，在上一次的大戰中，南洋羣島在奇安的状态下還睡着睡，這一次情形截然不同，他們現在已經在問——英國的政策是重行征服，還是實際的解放？

我們討論遠東及太平洋的問題，決不能離開防禦的事實，如果戰後鞏固世界的和平，仍然是一種各擴武裝各自為政的局勢，一切開明的國際經濟政策與殖民地政策，都重受影響。假定在戰後的世界，防禦任何方面發生的侵略的責任，能到逐步的國際化，則每一個預備獨立的國家，用不著單獨負起國防的責任，他們可以受有參加及履行為共同防禦而成立的國際性組織的義務與責任。我們再一推想東亞國際變化的演進，現時在華盛頓常常開會的太平洋作戰會議，可能在戰後繼續的存在，而演進為太平洋政治會議，由這個政治會議產生了南太平洋共同防禦侵略的機構，預備獨立的南洋羣島，可同意的讓予因建築共同防禦工事所需要的據點或地帶。在這些防禦的地帶與據點，亦應准許南洋民族有相當的訓練隊伍混合參加駐守，無論南太平洋防禦的制度如何產生，或者就是英國自己負擔防禦責任，這個問題，決不能亦不必阻礙南洋民族成爲一個自治聯邦的進步。

戰後英國殖民地的政策，對中英兩國的關係，有極大的影響，中英關係中待解決的問題，應予以深切考慮，莫如香港。從香港起至新加坡哥倫布亞丁蘇彝士博斯馬爾他及直布羅陀，是地理上形成一串的英帝國海國防禦點，與航行集中點，我們要明白，如果英國在地中海失去直布羅陀或蘇彝士，或在印度洋失去哥倫布，或亞丁，他的一等國的地位立刻會降低兩級，

幸而香港係在帝國路線的尾巴，放棄香港，只是縮短而不至切斷，維持帝製的路線，在戰爭的期間內，如果明白的表示其對香港的態度，在英國方面有說不出的苦衷，如果宣佈放棄香港的主權，怕中了日敵譏諷其失敗主義與逃避責任的反宣傳；如果公然宣佈他意圖恢復戰前的狀態，勢必促成聯合國共同戰線的裂痕，危害盟邦的合作；在英國未曾凱旋入香港以前，欲希望他能對關於香港的問題對中國作任何的諾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猛速的軍事演進中，遲回的外交，會引起不幸的疑慮，在太平洋戰爭後一階段——最少在戰事未結以前——關於香港的地位，兩國應達到一個諒解。如果英國的目的，在再以武力建立殖民地版圖，中英兩國殊歧異的地方，何只香港的問題，如果英國承認與接受亞洲殖民地演進的潮流，關於香港的問題，自不難得到雙方均能滿意的解決，一個完全獨立和自尊的中國，確切期待着共同勝利的盟友，能作到矯正一件歷史不平正的事跡。我們要指明將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並非是限期的無條件與立刻退出，以前香港的行政機構與英籍的公務人員，仍可由雙方商議協定予以繼續，以前香港殖民地政府與私人的財產利權，中國政府應完全的給予承認與保障，中國政府亦可繼續的維持香港做一個自由的通商港口。假定太平洋有中國活動參加的國際性的軍事設防，香港被擇為一個據點，中國政府亦應給予種種便利，一個勝利的英國，高舉亞洲真正新秩序的旗幟，作一件偉大的政治事跡，更可發揚其偉大和增強其在遠東商業的地位，一個勝利的中國，無數十年如奮鬥，在他的領土內尚留着一塊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遺痕，自然會引起相當的不快，香港可能成爲中英兩國真正與堅定的友邦部交的富有歷史性的地方，亦可應變爲中英兩國關係難於融洽的殘影。

如果英國有意做中國的真正友邦，香港對於兩國的合作與諒解，除政治外，還有極大的貢獻，英國人有足令人欽佩的特殊才能，正如中國人亦有足令人欽佩的美質，過去因爲成見太深的關係，英國人在香港的特長未嘗受到中國人真正的賞識，假定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在他新的地位，中國會虛心的領略英國人在香港表現的特長，除行政管理與工商業的發達外，最富有建設性的是英國的司法行政和學術精神。

司法行政是中國亟欲進步而爲英國具有特別技術的社會科學，香港有悠久公正司法的歷史，如若在中英兩國關於香港的協定內能夠僱用在香港的英籍法官，在中國的法庭執行中國國家的民法刑法，本其公正無私與人道應度的背景，對中國整個法庭制度及聲譽一定有不少的裨益。

英國的學術與科學方法與我國文化合作之發展，較爲遲緩，其原因在以商業爲基礎的殖民地思想產生的社會空氣與環境，不適合文化的溝通，雖然香港有學術精良設備完滿的大學，一般人的印象中未能認爲香港大學能夠代表英國的學術，在中國的教育與學術界上，香港大學，並未享得其所應有的學術地位與聲譽，以中英兩國關係之長久及其未來之重要，實在須要在絕對平等與自由之環境內，有一個最高的學術來代表英國的學術精神。如果英國的一個外國傳信員——香港，能說認爲中英兩國友誼與互信的橋樑，則在學術的環境與空氣，開明的香港大學，可喜成爲英國文化的海鏡，來發揚英國民主治和寬容的精神，和作爲中英兩國學術研究與交換的媒介。

一百年來中英間不愉快的歷史已經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英的新約行了阿羅禮，舊約終於將一九二六年張伯倫外相應許的一堆無禮物一獻出了，然而搞去了外交的文飾，這個條

約等於正式承認中國歷年奮鬥將成未成而卒被日本侵略行動攔阻的一般以前不平等的事態。具有建設性的新約尚待雙方的商榷。關於英國最注意的戰後中國貿易與市場的不等機會，中國既然自動的往憲政的路上邁進，應可給英國不少的安慰，就着便利戰後的建設，公私企業和中外合作的規範，如無因受別的問題所牽制與顧慮，明文規定中英兩國通商的關係，似乎無需受時間的限制可提早的確定，這對於中英合作發展的好處預備是會有利的。

在中英兩國複雜關係中有一個問題，不是文字能顯明解釋的，這個問題既不能用一個名辭來說明，亦不容易指出發生之原因，一百年來，兩國間不愉快的關係，和自九一八事變至珍珠港事變十年來的枝節事件聯合的結果，產生了一種心理上的

間隔，不知不覺中表現在私人的談話，公眾的討論，報章的節目，並在其他的事跡上，中國的心理，對英國有若干微惡的感覺，實在是不能否認，亦實在是不幸的。在中英通商以來，兩國智識界和有思想的人士，對於中英真正友誼的需要，其感覺未嘗如今日之深與誠，但是雙方心理的一種漠然的冷淡，從未會溫暖起來，在這一種空氣籠罩內，不容易得到開誠的彼此交換意見和研究解決問題合理的方案，只有時間和誠懇的磨礱，才能慢慢的將此種不良的空氣消除。中國的外交政策，不應該誤會對英國的信任心特別高出對於其他的友邦，但是如果東亞和平是共同的目的，中英兩國不應有直接不能解決的困難，最主要的就是兩國對於一切問題的政治觀，應盡量接近一點，惟有建立政治的和平橋，方能達到共同繁榮的希望。

萬竹樓隨筆

(三十八)

舜生

侯官嚴幾道先生復，(1855-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年十五，入馬江船政學堂；二十五，留英積攻海軍戰術砲台建築諸學。戰學生以露連享大名，其海軍譯學乃為文學所掩。其譯著之最有名者，商務印書館曾愛刊為嚴譯名書八種，即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論，名學淺說也是也。其鄉人林琴南，以古文譯西洋小說百餘種，與之齊名，世稱譯村，多以嚴林並舉，其實以學力論，林固非嚴比也。

抗戰最後階段中吾國亟需之現代將校

孫寶乾

兩國戰爭之日，決定其勝負之因素固甚多，如兵力，資源，武器，裝備，給養，軍紀，士氣與軍事思想等，然而將校之優劣，其關係亦甚大。雖有勇敢之士兵與夫精良之武器，但若無優秀之將校，似仍無必勝之把握。由此可知，將校實可決定戰爭之勝敗，與國家之存亡，其重要性為如何矣。

將校之優劣，即「將孰有能」之問題也。關於此，孫子曾發一標準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孫子所言，仍不失為現代將校之座右銘，然現代戰爭已與曠昔不同，換言之，現代將校自有其新標準在焉。

現代戰爭，一方面為混亂之狀態，一於面為有秩序的出動坦克，飛機，大炮，與兵艦，不但包括各種科學與技術，且屬一種最繁之藝術。美軍專評論家炮蘭文，曾對現代戰爭之狀況，與現代將校在作戰時之如何行動，加以敘述如下：

「戰爭由數百人所計劃，由數千人所領導，由數萬人所戰爭。戰爭從未「按照計劃」，因無一人能窺見其全貌。初視之，一切在混亂之中，但其背後，確有計劃在焉。計劃，理由與想像，統制戰爭之進行，在原則上為不可變動，但在實施時，可隨機應變，戰爭之事，過於複雜，不能加以詳述，而將領與其參謀人員，亦舉其一生於研究如何支配戰爭。

「作戰綱領上言曰：不給兵力之大小，不論任務之繁簡，指揮官須為管制戰爭之玉腦，從其身發出能力與衝動力，以灌注於其部下。

「指揮官在戰時不應自身為一隊之長，不應僥倖或干涉其

部屬之權限，雖部屬中之無能者，應立即去之。彼應如朱匹忒（古羅馬之主神）高坐於奧林比克（古希臘之競技會）之上，彼應忍耐而有遠見，於無消息或不利益傳紛起之時，仍應保持其頭腦之冷靜。彼不為不完全或虛假之情報所欺而妄動，但彼亦不交臂失去黃金機會。彼須認識「戰爭之迷霧」，當使戰爭之情形，朦朧不明，或一時不能分明。但彼從其地圖上，從其報告中，從其輿論或部屬之會議中，獲得戰爭進行之全部情況。

「指揮官之下制參謀本部，通常分為二部分，一為普通參謀，另一為特殊參謀，前者分四課，一人專，二情報，三作戰，四供應，後者為專家所組成，如軍器，機械，坦克人員與空軍人員等，彼等或建議或協助前者。

「指揮官與其參謀人員指揮作戰部隊。所謂作戰部隊分二部分，一部分為步兵，砲兵，裝甲部隊等，吾人稱之為「軍力」，另一部分為供應，保存，與轉種部隊，吾人稱之為「軍務」。

「將領負指揮之責，參謀負計劃之責，但真正作戰者，則由以上所謂之「軍力」。軍力又由「軍務」協助或供應之。軍力之基本單位為營。以美國統制而論，三營成一團，三團成一師，二師或以上成爲一軍團，二軍團或以上組成一軍。

「每次作戰，先有計劃。由作戰參謀按照指揮官之意志，擬一計劃，同時參考情報課所供給之敵方情況。供應課負責供應，人事課負責受傷者之救護，死亡者之埋葬，以及遺失者之補充。

「各軍團獲知此項總計劃後，即按照其應担负之任務，自擬詳細計劃，命令各師與各團執行。再由各團命令各營。此項命令之傳遞，有時力求迅速，不拘形式。

「譬如某營長於前線在無線電話中接到此項上級命令後，立即詢問地圖，召集部屬開會，急遽登上指揮車，揮手言曰：『吾人就照此做去罷！』（文見八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雜誌）
 鮑氏雖未詳論現代戰爭中之現代將校，其應具備之素質如何，但吾人從其敘述中，已可約略見出其一二矣。依余觀之，現代將領應具備之素質如下：

第一，新軍事科學之智識。現代戰爭，因兵種之繁多，與武器之進步，已複雜萬分。凡為將校者，不但應對其專屬之兵種與武器，有深刻之研究，且須對其他兵種與武器，亦應有相當之認識。換言之，陸軍應知空軍海軍，空軍海軍應知陸軍。現代戰爭之新戰術為聯合作戰，各種兵種各種武器聯合運用，凡為指揮官者應熟知各兵種各種武器之用途與其限度，然後能求統一與聯合指揮之功效。所謂各兵種各種武器，包括步兵，砲兵，騎兵，戰車，飛機，傘兵，以及海軍方面各種艦類，於此可見現代將校之智識範圍為如何之廣泛矣。是故每一將校，應博覽各種軍事科學，庶幾能熟悉現代戰爭中之進步的技術。而高級將校，於軍事科學以外，尤應研究其他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第二，強壯之體力與旺盛之精力。此自為軍人應有之條件，因必如是，然後能忍受各戰場上之各種氣候，與克服戰爭中之艱難困苦。

第三，勇氣。左傳上曹劌論曰：『夫戰，勇氣也。』西方人亦有言曰：『打仗時，最要者不在學問與經驗，而在是否有

勇氣與胆量。』戰爭為至危險之事，軍人而無冒此種危險之勇氣，根本已不配為軍人矣。然所謂勇氣有兩種，一為對個人危險之勇氣，一為對於責任之勇氣。前者為出入槍林彈雨，而毫無懼色，後者則為由名譽心，愛國心與責任心所發之勇氣。由此兩種勇氣，經過情與理之磨練為平衡，而產生所謂大勇，非征服敵人不可之意志也，不屈不撓之氣節也，果敢接近一切困難與危險也，犧牲之準備也，認識失敗為永久之恥辱也，深信必得最後勝利也。有此六勇後，懼敵心理，自無由發生。

第四，領導之才能。將校為軍隊之樞紐，士兵之核心，故凡事應為部屬之表率，使士兵有歸嚮之中心，而後能於戰時同進同退，制敵之致命。而指導中最重要者為精神上之領導，此可從兩方面言之，一為意志之領導，即傳給部屬非勝利不可之堅強意志，另一為思想之領導，即統一部屬軍事學術上之思想。前者可提高士氣之旺盛，因將領必須指示部屬任何犧牲在所不辭，任何困難不能阻撓之意志，然後部屬有生死與共之決心。後者可以養成部屬之靈活性和獨立性。因指揮官之思想能統一部屬之思想，故部屬能於作戰時，與指揮官之觀察，判斷與行動，無大異之處。戰爭之時，千變萬化，而意外為戰爭之定則，是故指揮官不能專專用命令規定，亦不能專惠代替部屬判斷，但對部屬給予目的與全圖而已。知兵之將必先認識部屬之個性與能力，並考慮其所能達成之任務，然後給予其部屬以獨立性。英美當局於準備軍官之時，應用各種方法，以試驗其是否具有此種領導才能，蓋以此故也。

第五，組織與管理之才能。現代軍隊為一複雜之組織，如何組織之，如何管理之，以求發揮最大之效能，自亦為現代將

適應具備之才能。有人曾謂，現代將校有如大公司之經理，淘不經也。

福祿將軍言曰：「戰爭中至要之事，是在特殊之時機，認識含有未知素之情況，判斷映在眼前之事物，推知未知之事物，迅速作一判斷，而果敢實行之。」福氏所言之「認識」，「判斷」，「推知」，「果敢實行」，即為戰爭之藝術，亦即為將領優劣高低之度量標準也。此項才能，一部分為天賦者，故有人曾謂：「凡人苟非天生將才，不論如何好學深思，終不能成為名將」，但吾人認為大部分皆可由經驗，實習與學問獲得之也，換言之，可從修養得來也。

綜合以上所論，現代將校之標準與其應有之素養如何，蓋可明矣。茲再引前任英近東總司令，現任印度總督之魏非爾之言，以私東吾文。魏氏言曰：「甲，現代將領應具之資格：（一）應懂得對於糧餉與軍需作通盤之籌劃（軍事第一）；（二）須有隨機應變之才能；（三）須有尊重事實之思想（不尚空談）；（四）須有貫徹一切之毅力；（五）善於觀察，不知疲勞，心思靈巧；（子）須仁慈而又殘忍，（丑）須率直而又狡猾，（寅）須是一個守夜人，而同時又是一個強盜，（卯）須慷慨而又吝嗇，（辰）須寬大而又狹窄，（巳）須魯莽而謹慎；（六）應熟曉船務；（七）能吃苦耐勞，忍受戰爭中之寢食。乙，身體方面與精神方面之資格：（一）勇氣，（二）健康，（三）少年精神；（子）須有奮鬥精神與求勝意志，（丑）須有一些冒險精神，須有一些賭博者之精神。丙，心智上之資格：（一）有「何者可做，何者做不到」之常識，（二）有新軍事科學之智識。魏氏所言謂為吾人以前所論者之具體解釋可也。

此項將校，若能應時產生，誠國家之福也。此次第二次大戰，盟國之所以能戰勝軸心，亦因其能多出此項將校之故。如美艾森豪威爾，英之蒙哥馬利，俄之朱可夫，或前若屬無名之輩，但現今則皆升為元帥矣。英俄有新將才而生，而德國之將領，則局限於狹小之特殊軍事階級系統之內，此其所以敗也。

觀乎吾國，抗戰已近八年矣，然而新將才並未輩出，其故安在耶？由於新將才之不能脫穎而出耶，抑由於吾國之真無人才耶？以余觀之，「世不患無才」，患無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耳。吾國軍人方面，最大之病根，在於過分重視派系關係，地方觀念，不以軍事能力與作戰成績為選任與升降軍官之準則，以致昏庸敗類者，反得「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曾國藩語）

吾國今後誠欲渡過此危殆之抗戰最後階段，除健全各軍機構與人事編度外，尤應注重如何培養與提拔現代將校。培養之道，或非日夕可奏功，而提拔之效，則立時可見。合乎以上所言之素質與標準者，擢升之，不合此標準者，則斷然淘汰之。若不如是，仍堅持派系關係與地方觀念，則前途誠不堪設想矣，安論所謂建軍與夫使吾國軍隊立於國際之林哉。

蘇聯過去為一黨統治之國，然自戰爭發生之後，其將領不隸於共產黨人，亦不限於俄羅斯人，凡有真本領者，皆一一升為元帥，而担負方面之責，如現任參謀總長瓦西列夫斯基，曾指揮庫沙前線之羅索科夫斯基，皆波蘭人也，而驅逐德軍入東普魯士之波爾尼雅夫斯基，則猶太人也。因蘇聯如此，故能節節勝利，吾國可不鑒諸！

要之，軍隊亦應民主化，使成爲一種神聖之事業，凡有學

識與志向之青年，均可為軍隊服務，而軍隊中已有之品德與能力優異者，皆可擢升，而不必依賴任何身分，派系與手段。以民主精神改造軍隊後，自以人才主義為準則，不但可使軍隊成為真正之國家武力，且可產生若干合乎以上標準之現代將校。

歐几默德言曰：「給我一個支點，即可將全世界翻轉過來。」
吾人可斷言，若給中國若干現代將校，亦定可將抗戰整頓局面翻轉過來！

雲 孫 隨 筆

陶元珍

李鴻章奏稿自訂本

李文忠公全集，為吳汝綸所編，全集對於清光緒末，乃惟一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即據是影印。鴻章奏稿，具在全集中。全集本奏稿，公認為最善之本，遠勝坊間選刊。而據李文忠公尺牘第三十二冊復辦理天津水師學堂即補道洪翰香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伊犁副都統睿少珊保定督院幕府陳雨樵諸人書，則鴻章在時，曾自訂奏稿，石印分贈，是較吳編全集本更可珍矣。復洪翰香書云：「奏議選本編定後，匆匆付印，校書如掃落葉，原不能一過無遺，然止此十餘卷書，而謬脫至四百餘處，可謂漏網於吞舟矣。茲承詳加校勘，逐一訂正，眼明心細，感慨良深。擬將指出各條另刊木印，朱誌於側，以免疑誤。」又復睿少珊書云：「附寄石印奏稿一箱，平生政績，略具端倪，藉供瀏覽，少慰相憶之誠。」又復陳雨樵書云：「承索奏稿，容過便再呈覽。往事都如夢影，異日留供史料，或助談資耳。愚之慨然！」可略見自訂本奏稿梗概及李氏情懷。自訂本奏稿，係甲午戰爭後，鴻章以大學士閉居京師時，選編付印。彼時鴻章自份此生事業已終，故有是編之選，用留紀念。後來辛丑議和一幕，誠所不及料也。自訂奏稿包含年代，僅較全集本略少，而其僅十餘冊，則遠不及全集本數十冊之多。或自訂本字較細密，相差並不甚遠，惟既稱選本，所收必較全集本為少。惜自訂本今已極不易得，一時無從取而參校矣。

李文忠公尺牘共三十二冊，係鴻章函稿，由某友于式枚起草，經鴻章閱改者。全編起光緒十一年乙酉，終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為全集所未收，而適與朋僚函稿相銜接，可補全集之闕。尺牘原本至民國五年丙辰，始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

國際外匯基金組織的基本原則

——瓦斯克連斯基教授

戰爭與工人階級第九期

(去年)四月二十三日莫斯科公布一同盟國家聯合聲明的全文。同日，此一全文又在華盛頓、倫敦和重慶三處發表。在此全文中曾提及國際外匯基金組織。聯合國家為着貨幣的合作計，擬組織一恆久的機構，而此一機構的基本原則，在聯合聲明中已有論列。

從外國報紙的記載看，我們知道，此一聲明的公布，亦有一段歷史。關於穩定貨幣問題，誠為戰後世界經濟建設中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早在去年四月間，英美二國財政部均公布一戰後穩定貨幣的預擬計劃，以供各方面的研究參考。美國計劃的起草者為美國財政次長懷德(Harry White)氏，而此一計劃定名為「國際穩定基金」，而英國計劃的起草者為有名的經濟學者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其計劃定名為「國際清算同盟」。

由於美國專家和其他聯合國專家討論的結果，今日所公布的聯合聲明係以美國計劃為基礎，雖則此一計劃在討論的過程中，已經有極大的修改。在此計劃中首先涉及的問題，乃為如何理解黃金在戰後國際支付方面的任務。

凱恩斯計劃的出發點，在於否定黃金在國際收支方面的積極任務，而認為國家與國家間的支付，儘可藉清算機構調整，以保持一定的平衡。為達此目的計，必須另定一特殊的清算單位，以代替黃金在國際支付方面的單位。至於美國計劃，却承

認黃金的意義，而認為國際支付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我們知道，黃金在現代世界各國中，均被認為最普遍的等價物，而國際間的支付，均以此充之。由是看來，國際通貨，除貴重的金屬外，實無其他東西足以代替。各國貨幣，其在國內雖可流通無阻，但一出國界，便喪失其價值，而除了貴重的金屬外，再無其他東西足以完成國際支付的任務。因之，關於創造特殊的「支付票據」以代替黃金，在現代的國際流通上，僅就理論言，亦不能成立。穩定的貨幣，應當建立在黃金的基礎上，而惟有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國際通貨，方能幫助今後的國際商業日趨發展。這種見解不僅符合於現實的需要，且亦充分明瞭黃金和貨幣在今日國際貿易上的意義。

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最首要的一點，乃為成立一國際機構，而以黃金為基礎，穩定各國貨幣，同時解除國際貿易上的所有的通貨限制。凡加入國際基金組織的各國，如欲解除通貨上的限制和保證通貨為世界商業的競爭手段，而發生收支差額的不平衡時，基金組織應該出而予以支持。

聯合聲明的起草者認為，基金的用途必須有所限制。明言之，基金不得用以投資，或用以為出口資本等。為達此目的，必須再創立一特殊的國際銀行。關於創立國際銀行的談判，據不久以前的懷德表示，現在正在華盛頓舉行。基金的資產亦不得用以救濟或和與解放區。為救濟和復興解放區計，現在已創立了另一國際機構——國際救濟善後總署。基金的資產更不得用之於調整由戰爭的結果所產生的一切借款。基金的用途

僅限於國際支付方面。換言之，由於各國對外貿易所產生的正常的國際支付，始可動用基金。

爲此目的，基金組織擬徵集資本八十萬萬美元（或二十萬萬英鎊）由聯合各國分別繳納，倘使全世界的國家都加入時，則資本將增至一百萬萬美元。爲明瞭這一資本是如何龐大計，我們僅須指出目前公美的所有股份銀行的資本總額，亦不過八十萬萬美元。

凡加入基金組織的各國，必須按照其所認的攤額，繳納一定的數目。所繳納的數目，一部分必須是黃金，而其餘的，卽爲各該國的貨幣。至於應繳黃金的數目，應該等於該國所認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或該國所有黃金及變爲外匯的黃金的百分之十，而其決擇，視此二者之中，以何者爲小。凡因戰禍或爲敵人所佔領的受難國家，對於其應繳的黃金，尙可獲得減繳百分之二十五的優待。例如有一國家所認的攤額爲十萬萬元，則她應交付基金組織以二萬五千萬黃金，（假使這一數目少於其所存黃金總數的百分之十）和七萬五千萬該國貨幣。凡因戰禍或爲敵人所佔領的受難國家，其所認的攤額爲十萬萬元時，則其應繳納的黃金，非爲二萬五千萬，而爲一萬八千七百五十萬。

從專家所公布的聲明中判斷，各國所認的攤額似乎尙在協議中。這一攤額如何攤派，聲明中不曾明言。然而我們從以前美國報上所發表的材料看，卽知美國專家們欲依幾個公式，決定各國的攤額，而這些公式似能使人明瞭各國在國際支付上的大體的需要。這些公式爲：（一）國家收入，（二）黃金存量和現款，（三）戰前五年間的平均的年輸入，和（四）最大限的波動，卽戰前五年間以平均年輸出爲水準所產生的波動，而

每一公式皆賦有一定的比例。美國財長摩根索於（去年）四月二十二日嘗在新聞協會揚言謂，美國的攤額將達二十五萬萬元，而英國將達十二萬五千元（自治領不在內）。依據現有的估計，蘇聯的攤額，亦必達十萬萬元以上。

攤額的大小，對於該國在國際基金組織所演的任務，和對於基金的運用等，皆有決定的意義。依攤額的大小，非僅將決定基金管理權的分配，且將影響其所能利用的信用範圍和出賣黃金給基金組織的義務等等。從另一方面看，由於攤額的大小，復可保證基金的活動性和伸縮性，同時又可預防其波動。

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假使需要外國貨幣以彌補其收支差額的不足時，她便有權利利用自國通貨向基金組織購買其所需的外國貨幣。很顯明的，這種權利亦須有一定的限制。不然，各國向基金組織購買太多，非僅必使基金組織成爲空盤，且也必無法應付各種請求。因之，每一加入基金組織的國家，其可以用自國通貨，換取外國貨幣，應以一年中間不超過其所繳納的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爲度。要是存於基金組織的某一國的貨幣減少，而呈出低於該國最初繳納的數額（卽低於百分之七十五）時，則此一國家可隨時以自國貨幣加以補充，同時可從基金組織換取其所需要的外國貨幣。凡存於國際基金組織的任何國家的貨幣，不得超過該國所認的攤額的二倍。（二〇〇%）

這樣一來，每一國家可以利用國際基金組織，用自國通貨換取外國貨幣，以彌補其國際支付上的缺額，但其數目每年却不得超過該國所認的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其期限爲五年。茲再以上舉的認攤額十萬萬元的國家爲例，則此一國家每年可在基金組織換取外國貨幣二萬萬五千元，在五年中間共可換取十二萬萬五千元。

爲使基金組織可能獲得各國貨幣計，當各國的需要貨幣超出其來源時，基金組織便必須出動其黃金。從這裏，我們亦可看出基金組織之所以必須擁有黃金的技術上的理由。基金組織有借用或以黃金購買任何國家的（參加基金組織的）貨幣的權利。這樣一來，基金組織實以「金本位」在保證各國對外貿易上的國際支付。

然而當基金組織以黃金購買外國貨幣時，究竟再以何種方式補充其黃金的儲量？

基金組織補充黃金的方法頗多，而其中二法却與各國的權額機能有密切關係。第一、基金組織將要求某一國家（倘然這一國家的黃金存量已超過其提額時）當她每一財政年度欲購買外匯時，其所購買的外匯的一半必須以黃金支付。第二、基金組織在財政年度之終，如發現某一國家的黃金存量，和外國貨幣被變爲黃金的存量增大時，便可要求這一國家回購其存於基金組織的該國通貨的一部分。這一要求將應用於某一國家的貨幣存於國際基金組織的總數已超過其提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時，或該國家的黃金存量，和外國貨幣的被變爲黃金的存量，超出其提額時。此外，多金的國家，仍保有其新得的黃金出售於任何市場的權利。

除了這二種方法可使黃金流入基金組織外，誰都想得到的，每一國家復可依自己的需要，而用黃金向國際基金組織購回其自國貨幣的一部。同時，必有一些國家，因爲擬以黃金購買外國貨幣，所以便進而與國際基金組織進行此一交易。

我們看到，參加國際基金組織的各國，將與此一組織發生極複雜的關係。此一組織有否生命，僅可見之於未來，因爲過去在國際支付方面未曾有過類似的組織和經驗。無可疑議的，

由於生活和實際的需要，此一組織必定時有修正，而以非現在所有的性質和規模，當然，我們猶不能預料其是否適合於世界商業，是否適合於國際支付關係的實際要求。

基金組織的最基礎的一點，在於基金組織和加入基金組織的各國之間，必須協議一種以黃金表現的外匯上的等價。基金組織的會員國，依上舉美國專家的意見，必須負有不擅自改變自國通貨等價的相互義務。凡通貨等價的所有改變，必須經過基金組織的核准；反之，基金組織如未得會員國的同意，亦不得任意改變幣值。

從國際基金計劃的性質看，我們亦能知道，當欲改變外匯等價時，最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預防損失，而這種損失往往能使其他國家獲得商業外匯上的利益。因之，外匯等價的改變，假便是由於該國內政上的原因所誘起，且不與國際義務相抵觸時，則此種改變，在本質上便不屬於基金組織權限內的貨幣政策的範圍。由是，很顯明的，在金融專家的聯合聲明中便預先言明，基金組織對於這一類改變外匯等價的申請，不擬加以拒絕。我們知道，一個對外貿易完全國營的國家，對於這類外匯等價的改變，似乎無須經過基金組織的任何同意。因爲該國對外貿易係賦有國家的性質，所以比基金組織的任何決定，更善於保證此一國家的商業利益，而且，其外匯政策（包括改變外匯等價在內）亦絕不會與其國際商業契約相抵觸。關於這點，多年來的蘇聯對外貿易的經驗，便能給我們以一個最有力的見證。

誰都知道，蘇聯幣值的穩定性，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係建立在另一基礎上。由於實行社會主義經濟，而一切皆賦有「計劃」的性質，所以蘇聯能自行調整必要的行情和維持一

定的價值，而無須再藉補充的專設機構以確保其穩定性。由是，國際基金組織對於其他國家的通貨，雖有決定的意義，但對於蘇聯的通貨却沒有多大的價值。這使蘇聯通貨對於基金組織，事實上不得不處於另一種關係，而將來的基金組織的實際活動，對於這點亦不能加以忽視。

同時設定：基金組織與參加基金組織的會員國間的交易，必須以外匯等價計算，而會員國彼此間的交易，雖可依行市決定，但却應在相互協定的等價的百分之十的範圍內，依據金融專家的計劃，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必須負有以下義務，即不得以高於或低於自國所規定的外匯行情，買賣黃金；不得在國內市場，以超出基金組織所規定的限度外的行情，與外國貨幣進行交易；不得未經基金組織的核准，而採取差別的外匯政策，或訂定多種的外匯行情等等。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旅行於戰時的外匯調整，不能在戰爭勝利後的第一日，便馬上現出成效。因之，再規定三年為過渡時期，在這三年間，會員國認為必要時，可以保存此種調整，同時亦可採取步驟，逐漸地，儘可能迅速地清算那些阻礙國際貿易的所有限制。

以上便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本原則的梗概。我們必須指出，這些原則，係由各國財政金融專家所提出，而且目前僅止於一種介紹性質，而其政府並沒有任何聯繫，懷德在不久以前，曾對報界表示，（去年）五月底將召開聯合國及參加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會議，而在這一會議席上，將審議和確認這些原則。

當聯合聲明發表時，曾經獲得美國官方的好評。據美國財政長摩根索言，國會中的許多委員會，均贊成組織國際基金的計

劃。國務卿赫爾對此計劃亦有極高評價，而呼籲在戰事未了之前，應將此一計劃促實現。

然而，我們知道，美國有些銀行家和實業家却反對此一計劃。例如銀行家奧特奇在其「自由的美元」一文中對於基金組織的計劃持反對的態度謂：

「假使美國能夠在國內壓住通貨膨脹，恢復黃金在國內流通，同時解除外匯方面的所有統制時，則美元對於其他國家的外匯，將成為最有希望的定額，她將被公認為外匯流通上的唯一單位。」「紐約時報」和「紐約先鋒論壇報」於註解專家聯合聲明中所擬議的國際貨幣基金之餘，復寫道，穩定貨幣的最好方法，無過於每個國家採行清醒的經濟，財政，信用，和外匯政策，在這些政策聲中務使達到其他國家不蒙受損失的目的。

紐約時報寫道：「每個國家不應該存有一種思想，認為與其鄰國進行經濟戰爭，必於自國有利。須知，在這種思想上的改造尚未成功之前，各國的幣值是不穩定的。倘然此種思想改造不曾實行，則所有的國際穩定基金，亦必無成功的可能。在思想改造達到目的之日，所謂複雜的國際機構和龐大的基金，皆為多餘的東西。」

紐約先鋒論壇報認為基金「可能協助在外匯上的國際合作發展，和解除一時的失調，但却不能療治由外匯的慢性的不安定所誘起的宿疾。」

一般看來，英國較之美國，對於專家倡議組織國際基金的聯合聲明，似採取較保留的態度，倫敦泰晤士報寫道：「我們對於其成功，不要信心太大。對於基金最重要的，為美國能夠安定的繁榮，不發生動搖性的貶值，和不致將美元幣值忽然提

高，忽然驟低，因為由於這些措施所產生的損失，必擴大於遠在美國國境之外。這些個別的提高和降低，便夠使任何國際外匯計劃化為烏有。」

在這裏我們應當再補充一句，猶如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一般，美國的經濟亦免不了存有內在的週期的恐慌。泰晤士報的提示，非為無的放矢，乃在告訴我們，戰後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循環的運動，將帶來一種極大的危險，而這將影響基金組織的活動，很顯明的，不問基金組織採取何種方案，未來的經濟危機可能破壞個別各國的幣值的穩定。

即從英美報界的首次的反應看，亦可知道此二國的工商界人士，事實上早已想到橫於基金組織的實際活動之前的許多嚴重的危險。他們或許因為有鑑及此，所以纔在設法使基金組織不須負有太廣泛的任務，總在設法使其工作僅限於商務方面的國際收付的調整。

萬竹樓隨筆

嚴又陵先生晚年與熊純如書札，曾有數處論及袁世凱，其一云：「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極其能事，不過帝制時一才智推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學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冀同邦某，嗚呼，非其選衡。願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見學衡雜誌「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十一）又其一云：「（滬上）生性好用詭詐，以錮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與謙貞，若宋敏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騷然，皆以為滬上之所主使。夫毅與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為，然猶可為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於出此，則輩下幾何其不解體乎？……又况段祺瑞去秋辭職以後，數見危機，寢饋之間，不遑宵處，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嗟夫，滬上父子之間，僅十餘人耳，左右雖親，炎涼變態，利害則交亡，即欲長此不去，誰與共排難乎？……」（見同上第二十。按是書作於民國五年。是年先生曾寓書袁氏，勸其謝事歸隱。）

除此而外，尚有許多批評基金組織的具體意見，亦值得我們注意。我們應注意的是，像國際基金組織那樣龐大的國際經濟機構，依其本身的存在，便頗可能召致弱小國家的若干危險。同時還有一個事實，即：不問將來基金組織將擁有何種權利，每一參加基金組織的國家似不能保留一種權利以確定：基金組織對其經濟所作的決定，是否適用或可接受的問題。從此或可謂，「這些決定」必須看為一種介紹（或建議）性質，以供會員國家參攷（或攷慮），至於內政問題，因各國主權所在，基金組織實不便干預。至於基金組織和實行國營貿易的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很顯明的，基金組織也不能忽視這些國家的外匯問題的特殊性。

惟有充分放慮參加各國的經濟的所有特殊性的條件下，這一國際機構方有順利進行其工作的可能，方能達到在外匯金融方面實行國際合作的目的。

齊生

法國的政黨與抗敵團體

沈項芳

法國有兩個民意機關，一是國民參政會，一是全國抗敵會議。關於法蘭西的國民參政會，本刊第十二期已經介紹過了，現在再來敘述法國各黨各派及抗敵團體組成的全國抗敵會議。

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法國地下活動，風起雲湧，遍地燃起復仇的烽火，在海外，倫敦的「民族委員會」和阿爾及爾的政權正當談判合作的時候，法國地下各抗敵團體，各黨各派及職工會也成立了一個統一性的全國抗敵會議。

它的發起人是一位地下青年，化名馬克斯·MAX，過去奔走於各抗敵團體，擔任聯絡工作，也曾秘密到過倫敦和戴高樂將軍會面，他帶了無線電具，用降落傘跳下，從此和海外互通消息，盟邦由天空擲下武器，各抗敵團體也就展開更廣泛的地下活動。

一九四三年五月首次召開「全國抗敵會議」全國各抗敵單位，各黨各派，各工會，各文化團體機關和各宗教機關都派代表參加，一致通過成立「全國抗敵會議」，並承認在臨時政府沒有回來以前，它賦有最高權力的行政機構，同時也是本土地下活動的總領導機關。它的基層份子包括十九個單位，即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民主聯盟，大衆民主黨，共和聯合黨，總工會，天主教職工會，民族陣綫，北部解放會，復仇會，軍民抗敵會，戰鬥會，游擊隊，南部解放會，抵抗會，保衛法蘭西社，北方之聲社，洛林社，全國會議的代表共四十人。在納粹及維琪偵察密佈之下，開會極感困難，地點變更多次，有時

在貧民窟內，有時在古堡或教堂內，從未被人發覺。每次在開會前半小時，由秘書長茂尼埃把出席人員一個一個的去找來。茂尼埃告訴人說：「巴黎這麼大的一座名城，我們混在城內，用不到化裝」。他是急進黨領袖之一，戰前在人民陣綫時代，曾任萊翁勃倫內閣的軍需部長及國際和平運動會副會長。

全國抗敵會議有二項重要目的：一、在團結本土地下抗敵團體及各黨各派，彼此發生密切的連繫。二、在本土解放後籌備國會選舉，實行民主政治。馬克斯自倫敦歸來後，不久被納粹捕去，壯烈殉難。後來由皮杜爾繼任主席，設置五位常務委員共負負責。另設軍事行動委員會，指揮內地軍。

全國抗敵會議之下，設有「各州解放委員會」C.D.E.由各抗敵團體及各黨各派推定代表一人或二人組織而成，來主持各州解放地區的地方行政。它管制「各地方解放委員會」C.L.和「巴黎解放委員會」C.P.還有幾個附屬的團體如：「勞工行動團」，它担任意工和被壞的指導，它的支隊中，特別是鐵路職工，最爲出力，曾做了許多非常有效的破壞，由於他們的忠勇和殉難的精神，即納粹也表示無限的敬意。後來德軍不得不常駐重兵來保護鐵道，並派出大批間諜去跟蹤鐵路人員的行動。但火車仍不斷出事。另有一個社會服務團，幫助殉難人員的家庭，如其家長失蹤或投奔「馬基」他留下來的妻小無法生活，社會服務團就負責接濟，發揮了互助的精神。

全國抗敵會議的政綱，分爲政治、經濟、社會三類：

(甲) 政治，一、擁護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臨時政府，保

衛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並恢復法國在國際間的權威和強大。二、懲罰賣國賊和法奸。三、沒收賣國賊的財產，凡操縱黑市囤積投機，或利用職權，橫徵暴斂所得來的產業全部充公；同時沒收敵人全部的產業。四、恢復普選，保證人民思想、信仰、意見和言論絕對的自由。凡人民住宅及書信秘密不可侵犯，且在法律前平等。

(乙)經濟：一、建立純正的自由經濟和民主的社會；排除大經濟壟斷的私人集團及大財閥的封建制度。二、成立國家機構，調和私人利益及國家利益，凡過去法西斯專制及壟斷下的國家經濟機構，全部解放。三、政府徵詢各生產代表的意見，擬定計劃，加強國民經濟生活。四、各項大企業，重工業，礦業，保險業，大銀行都收歸國有。五、補助貧者，農業和農民合作事業的發展。六、凡有資格的工人都得加入國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並自由發表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意見。

(丙)社會：一、改善職工的地位。二、調整薪津和工資。三、穩定幣制，提高民間的購買力。四、擬定綜合性的計劃，安定社會，保證一切公民均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五、職業須有保障。六、實施有利的物價政策，提高農民生活的標準，改良農業，並用社會立法，保障農民和工人享受同等的權利。

法本土最初成立的地下團體也就是全國抗敵會議的基層份子，在南部有「戰鬥會」COMBAT、游擊隊F.T.，北部解放會LIB-SUD，復仇會G.T.V.，抵抗會C.D.R.，北部解放會LIB-NORD。後來，這許多團體感覺有聯繫的必要，組成一個「抗敵聯合運動會」M.U.R.，共產黨在這些團體中起着領導的作用，特別在「游擊隊」裏都是共產黨員，其他不論在北部或南部的各抗敵團體中，它的幹部人物差不多都是共產黨員，

他們組成「民族陣綫」F.N.，來領導這些抗敵團體的行動。

「民族陣綫」成立於一九四一年，領袖居里夫人的女婿奧圖·居里 OLIOT CURE 及維勇 V. LION。他號召愛國份子，不分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共同合作，首先應遷納粹，完成祖國的解放。他們須在德軍佔領的地區內破壞敵人一切的設施，懲處賣國賊及維其合作份子。

共產黨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曾被政府解散後，即變成秘密組織，說到地下活動。當然共產黨的資格最老，本土陷陷後，它不但領導自己的「民族陣綫」，還控制了其他抗敵團體組成的「抗敵聯合運動會」。它在法國北部工業區域內的潛勢力很大。現在它採用了一個適合於各黨各派共同的綱領。共產黨領袖多列士說過：「馬克斯的理論，唯物論與辯證法不是一種定理的信條而是一種行動的準則，這種定理是以時間來轉移的，在目前新的環境之下就有新的定理來替代了，現在共產黨員的信條是戰鬥和工作，來迅速希特勒的崩潰，而保障民主的勝利，並願望法國的強大」。

社會黨(舊日的第二國際)它是領導地下活動的大政黨之一，現在它的地位僅次於共產黨。——社會黨領導的「全國解放運動會」M.I.N.；它的團體「有保衛法蘭西社」D.F.，北方之聲社 VOIXNORD 洛林社 LORRAINE 抵抗社 RESISTANCE。並包括幾個抗敵軍事團體。領袖薩陽 SAILLANT (現任全國抗敵會議主席)，羅安 Gouin (現任全國諮詢會議主席)都是這團體的中堅份子。它的行動綱領(一)立即逮捕合作份子和投降派，嚴予處罰。(二)附逆產業全部充公。(三)沒收公物，走私資敵，查明實據，一律槍斃。(四)嚴厲對付者，或強佔抗敵份子的財產均受重罰。(五)肅清中央和地方

各行政機關的貪官污吏，特別是財政部須迅速予以改組。(六)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七)大企業，大工業，電力及公用事業等收歸國有。(八)重整法國軍隊。

社會黨本身的綱領：(一)支持法國和盟邦對敵作戰到底，迅速完成全面勝利。(二)戰後世界，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推翻托洛斯基的壟斷和資本主義者的壓迫，使人類和國家得到真正的解放。(三)法國各項工業和經濟改革，非採用社會主義方法才能實行。(四)勞工階級從資本家壓迫中解放出來以後，將發揮他們全部的技能去努力集體生產，對農民也是如此。(五)國際間保持永久的和平才能實行社會民主與國際民主。(六)對於處置德國敵人的軍需工業機構和軍國主義的精神必須澈底清理，廢除德國的重工業和各種可怕武器的製造。(七)推動共和民主革命，建設自由與公正的社會。

急進黨，和急進社會黨，它的黨綱既不是急進的，又非社會主義者，乃是過去在政治上專作投機的一個政黨。它主張進步的資本主義，反對宗教教育。多少年來，農民說話，過去的領袖如赫里歐，達拉第，旭丹輩，赫里歐被納粹架走，現在德國，達拉第因戰事責任問題，被捕後生死不明；旭丹在美國作寓公。急進黨造成羣龍無首的狀態，現任殖民地部長賈高必是唯一的領導人。戰前，急進黨是法國第一大政黨，現在連第三把交椅還坐不到，除了共產黨，社會黨以外，就該輪到大眾民主黨或民主聯盟了。

人民共和運動會 M.R.P. 是大眾民主黨，民主聯盟，全國共和聯合會組成的一條地下活動的抗敵陣綫。戰前都是些中間派的小政黨，在地下時代流過多少血汗，擴展了勢力，它已取代了過去急進黨的地位。

領導人有皮杜爾(現任外交部長，德孟東(現任司法部長)，戴尚(現任宣傳部長)，它的七項綱領：一、對國家，(A)絕造自由，強大和公正的共和國，(B)尊重人民的主權及各種基本的自由，(C)絕對消滅法西斯的意識形態，尊重人權，(D)排除托洛斯基和專利；(E)公用事業歸國家經營，例如電力，礦產，運輸和銀行業等。(F)言論界必須公正而自由。(G)全國普選，產生代表民意的國會。(H)婦女享受同等的選舉權和恩給金。二、對家族，(A)給予津貼和救濟金，(B)父母對其子女得自由選擇學校。(C)重視家庭衛生，主婦必須負責管家的責任，三、對青年，(A)實施職業教育，授予經商智識，(B)舉辦結婚貸款，三星期的蜜月休假，薪資照給。四、對法帝國，(A)恢復領土主權，成為列強之一，(B)加強國際機構，使其有能力保障世界和平，(C)法國重整軍備，(D)尊重道德和宗教傳統。五、對勞

工，(A)保障勞工階級最低限度生活的工資，自由組織本身的團體，凡經濟機構和企業的管理，勞工階級亦得參與其間，(B)土地產物由資本家與勞工平分。(C)實施勞工保險及社會政策，(D)保護技藝專家的專利，獎勵私人發明，(E)組織體育會和俱樂部。六、對戰俘，(A)從速恢復他們在國民生活中一切的地位和權利。七、對全體公民，(A)看重自己的工作來增進生活的愉快，(B)努力建設團結統一的法律，(C)個人意志的自由和國家法治的進步。

「軍民抗敵會」 C.M. 是前綫潰敗下來的士兵和兩次參戰退伍軍人所組成的地下團體，在每一武裝抗敵團體都有該會的會員担任軍訓和指揮，他們排出的綱領如下：
(一) 普選必須消滅欺詐手段，過去國會裏的弊端和議員

的保守思想絕對不容其再存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有選舉權，並由大政黨或團體起來執政。

(二) 民事行政機構必須由實履行民主制度，不得利用個人的職權和地位來假公濟私。

(三) 報紙維持職業的自尊心，言論絕對自由，不為利慾或津貼所操縱。

(四) 創造新社會，教育平等，一般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

(五) 國家經濟機構保證公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提高勞工地位，並得參與工廠行政管理。

(六) 不論任何政治制度，都由人民統治，且必須尊重他們的主權，如其發覺政制腐敗應該立刻予以推翻，免其禍國殃民。

(七) 人民賦予政府最高的權力，如遭遇重大的困難，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雲 孫 隨 筆

蕭 毅 刀

李鴻章在北洋，曾向德國定製佩刀多柄，分給部曲，所謂蕭毅刀是也，餘刀存天津機器局，厥後僚屬友好亦多索贈者。李文忠公尺牘第三十冊復直隸藩台員梧岡台季士周書云：「承取德國所製蕭毅刀，當即函屬津局，檢配兩柄，就近寄至保定，分送冰案，到希查收。」又致復辦天津機器局即補道承敬兩書云：「頃接員梧岡方伯季士周廉訪來函索取德國所製蕭毅刀，即請檢出兩柄，裝配齊備，由津交使人運寄省城，分送兩司案中查收。此項刀件，近日來案者頗多，局中存儲尚有若干，便中并祈查示為盼。」又復員梧岡書云：「昨奉來書，知由津局配送之蕭毅刀，已承察入，過勞推挹，緝荷如何。」(復直隸藩台員梧岡)又復湖北提台吳儀堂書云：「承索蕭毅刀，當飭津局配齊全副，交來差帶回。」均關於蕭毅刀之掌故。夫昆吾切玉，大食精鐵，並異域之精良，為當時所推許。鴻章遠憶德廠，製器銘勳，長昭蕭毅之封，上續弘景之錄，豈惟佳話流傳，亦見接受西法。當員季吳諸人來函索贈時，鴻章已因對日戰敗，去直督任，方以大學士閑居京師，撫今思昔，能不慨然！前引復員季二人書又云：「弟試早及錄，用甘肅器，惜六州於魏博，槐一割於誰承。一城激乎言之也。」

(八) 托拉斯制度增加人民的負擔，今時代以獨立的工業家，商人，工匠或店員，發展他們的企業，以重私人集團的專利，廢除一切包辦制度。

(九) 懲罰買賣贗贗，決不寬赦，並依法審判操縱黑市的投機商人及營商雜財者。

(十) 組織人民的軍隊，編制內地軍為正規軍。

總工會 C.G.T. 在一九四一年被維琪解散，會員原有五百萬人，大多轉入地下活動，重新組織新工會，執行委員會包括社會黨四人，共產黨三人，它和法國另一個勞工團體——基督救工會 C.T.O. 非常融洽合作，共謀勞工的福利，還有智識界職工聯合會，農業協會，農民聯合黨及工業聯合會，這許多勞工團體在巴黎解放後，正醞釀着要組織一個勞工黨和農民黨。戰前，法國小黨林立，戰後仍舊如此，再過一二月，普選就快開始，各黨各派都要忙於競選了。

陶 元 珍

緬甸的普選

張禮千

一八二四年一月，緬勇將班杜刺從阿臘干進討來犯的英印軍。同年三月五日，英印政府遂正式對緬宣戰，是為首次英緬戰爭之始，五月十五日，英軍乘虛登陸仰光，並加佔領，緬王孟既急召班杜刺回，禦仰光軍，以武器器殊，緬軍大北，班氏中流彈死，次年四月英軍遂陷卑謨，一八二六年二月奪悉蒲甘，三十四日英緬各遣代表，會於距首都阿瓦四十五哩的養達埔，締結和約，結果緬屬的阿臘干，顛拿沙廉，阿撒媽三區割讓與英。

當緬王蒲甘明在位時，待在緬英人頗厲，且重徵英商賦稅，英人不能忍，訴諸印度英督，督遣使查詢，緬人復不為禮，英印政府乃于一八五二年三月十五日致最後通牒，限四月一日答復，屆期杳然，英軍即於四月五日佔馬都，八月十二日陷仰光，十九日略勃生，這都是緬甸的要港，秋十月九日再取卑謨，至十二月二十日英將通告緬王以白古（勃臥）屬英，次年一月二十日英印政府更正式宣佈，以白古為中心，便兼併了緬甸，並於六月二十日英緬再締和約，英緬二次戰爭始止。

緬王西保頗具胆略，思聯法以制英，卒締攻守同盟密約於瓦城，事成，允以湄公河東岸的領土讓法，旋被英人偵知，大驚，遂定兼併上緬政策，此為英緬三次戰爭的胚胎，一八八五年秋，英緬以商務問題又起齟齬，緬王即於十一月告全緬民衆驅逐英人，九日英方抗議，十四日英軍即直薄阿瓦，法人沒有來援，二十八卒陷首都瓦城，緬王被俘，流放印度，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英國乃正式宣告合併上緬，於是緬亡，降為印度

的一省。

印緬合治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始倡分離之議，其理由有四：一印緬的人種語言文化歷史和社會組織完全不同，二依據一九二一年修正的印度統治法，在印度中央會議中的緬人議席僅佔五名，是以每不能顧全緬甸的利益，三緬甸歲入的半額須納諸印度政府，致緬甸的財政基礎受威脅，四印人的關稅政策，不合農業國緬甸的經濟利益，同時因印人資本的自由流入，致壓迫緬人的經濟活動，又因印度勞工的移殖，使緬人生活程度低下，遂影響於緬甸民族素質的劣化，嗣後印緬分治問題頓趨白熱化，至一九三五年印度統治法和緬甸統治法便各別制定了，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復頒新憲法，也就是緬甸統治法的重訂，這樣印緬方正式分離，而緬甸歸英直轄了。

這新憲法（緬甸統治法）共十四章，一百五十九條，非常複雜，關於行政部門，總督是英王的代表，係行使緬甸的統治權者。同時南擇北擇和加蘭尼三部落，則稱總督直轄區，或稱特別區，或稱東部諸州，而在緬甸統治法適用範圍以外，所以這新憲法的實施區域，僅佔英領緬甸的百分之六十，換句話說，就是僅生於緬族住居的地方，按緬甸歸英後，把它劃成七管區和一特別區，其屬上緬甸者，是物外管區（第悅茂縣除外），曼德禮管區，實皆管區和一特別區，其屬下緬甸者有阿臘干管區，白古管區第悅茂縣，伊洛伊底管區和顛拿沙廉管區，茲將緬甸的行政區域和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緬政府公佈的人口，列表如下：

管 區	管 轄	人 口
阿 臘 干	昔開、阿臘干山、叫漂、仙道佈、	一、一八六、七三八
白 古	仰光、白古(勃因)、確耶瓦利、罕邁德利、永盛、卑泰	二、九六一、二四九
伊 洛 瓦 底	勃生、興實搭、彭名、毛於寬、壁磅、	二、六五九、一二六
緬 拿 沙 羅	東牛、沙溫、直通、奄哈士瓦、丹蓬、	二、一一〇、四二〇
物 外	土山、木谷具、智巫、吻外、嘉悅茂、	一、九〇五、八〇九
曼 德 禮	曼實禮(瓦城)、叫棟、敏達、	一、九〇七、七〇三
實 皆	密芝那、八莫、上親墩、下親墩、傑沙、瑞帽、實皆、	二、三二二、六七五
總 督 直 轄	(南直、北直、加蘭尼)	一、七七〇、〇七八
合 計		一六、八二三、七九八

在這總人口中，緬人約佔一千一百三十二萬，加蘭尼人約一百五十萬，印度人約一百三十萬，緬人約一百二十萬，華僑約五十萬，親山人三十五萬，阿臘干人三十三萬，喀賓人十五萬，得楞子十四萬，具有選舉資格的公民總約四百二十萬，其中女性凡七十五萬，約佔選舉施行地域全人口的百分之廿五。

一九三七年的緬甸統治法，緬甸採行議會制度，但英本國議會依然對緬甸為最高的立法機關，換言之，緬甸議會須基于英本國的最高法權制定緬甸統治法，所以說緬甸議會是有自主性的議會，尚不恰切。至緬議會的構成，要素有三：一為代表英王的緬甸總督，一為上議院，一為下議院，上院議員定數凡三十六名，其中半數十八名是由下院議員中互選而來，另八

名由總督指定，任期七年，下議院共有議員一百三十二名，係用普選法選出，任期五年，議會年開二次，一在三月，一在八月，三月的會討論預算案，八月的會討論一般法律案，後者開會時期因適隨候風 (monsoon) 故俗呼「濃蒸會議」。

緬甸統治法的基礎，奠於普通選舉制，選舉資格依年齡納稅力和教育程度而定，凡有選舉權者不問男女均有被選舉權，下院議員其年須在二十五歲以上，上院議員須在三十五歲以上，這是主要條件，下院議員的選舉，分一般選舉和特別選舉，前者的選舉法依民族為別，計自一百十三選舉區內選出議員一百十六名，後者以團體為別，計自十一選舉區內選出議員十六名，全議席一百三十二名，其中緬人佔九十五名，如下表：

種 別	選 舉 區	議 員 定 額
緬 人	一四	一四
加 蘭 尼 人 (地 方)	七	七
印 度 人 (都 市)	八	八
英 屬 混 種 (全 國)	二	二
歐 洲 人 (全 國)	三	三
仰 光 大 學 (緬 人)	一	一
商 會 (緬 人)	二	二
同 人 (印 人)	五	五
同 人 (緬 人)	二	二
同 人 (華 人)	一	一
仰 光 實 業 (英 系)	一	一
印 度 協 會 (印 人)	二	二
勞 工 協 會 (印 人)	二	二
同 人 (緬 人)	二	二
合 計	一四四	一三二

這種普選方法，是否合理，本人不願討論，不過就事實言，緬甸在東方的殖民地中，計算具有民主雛形的一個國家。

輔佐總督的行政部便是內閣，閣員十名，總督得從下院議員中選任之，實際，總督僅從下院的多數黨（如國民統一黨，平民黨，自主黨，現代社會黨，愛國黨等）中選任首相，然後和首相商榷其他閣僚，這是慣例，在太平洋戰事前緬甸內閣，計由首相和農林、內政、財政、工商、稅務、教育、勞工、衛生、交通等九部長而成，閣議時的議長是總督，但通例由首相代行，內閣的權限固於緬甸內政，像國防（另置國防部，歸總督直轄，內設參議三名，二英一緬），外交和貨幣等，總督得自由裁量，僅容許內閣擬擬討論而已。

以上所述是緬甸戰前的政情，我想不難收服後，仍不會有

雲 孫 隨 筆

清仁宗賜英王勅諭原件

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使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至中國，提出各項要求，高宗悉予駁斥，然於英使待遇優，故馬戛爾尼歸後，對高宗猶存好感，中英間亦未生芥蒂。仁宗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英使阿墨斯特（William Pitt Amherst）復至，以儀節之爭和及清廷接待諸臣之含混上奏倉卒引見，致阿墨斯特及副使均拒不入覲，仁宗亦震怒，立將阿墨斯特一行逐回，兩國關係遂趨惡化。仁宗為此曾賜英王勅諭，責阿墨斯特等無禮，並囑嗣後勿再遣使。勅諭全文，具載實錄，王先謙東華錄錄有之，原件則存英外部。薛福成四國日記光緒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記云：「英外部侍郎山特生面約參贊馬格里（英人，原名為 Haidy Macartney，久任中國駐英使館參贊。）赴外部晤談，據云清釐檔案或有華文要件屬其代遞也。余屬馬君，如有要件，可暫送至英館，交張曉帆錄一清稿見示。既而馬君來至巴黎，告余曰，外部有一匣，黃綾包裹重疊，度存室中七十年餘矣。但相傳由中國寄來，並不知為何物。今啓視之，則匣內復以黃綾包裹竹筒，筒內有兩帖。展視則嘉慶二十一年仁宗皇帝賜英吉利國王勅諭也。係清文漢字兩丁文三樣合裝。余悉閱抄稿，乃與王益吾祭酒東華錄錄所載，一字不差。昔年風氣未開，中西語言文字莫相通曉。觀其包裹完好，久度外部，蓋基廷固無人能破者，實未嘗啓視也。」案勅諭既有廣丁文譯文，故廷何至無人能破蓋由速使致破，不願啓視，故包裹完好如故。亦幸未啓視，否則會增英人惡感矣。薛氏將任出使英法德比四國大臣，輪駐倫敦巴黎兩地，其見勅諭鈔稿，方在巴黎，於於勅諭原件未克親見。日記謂「恭讀新諭，辭義正大，洵足折禦遠人。此為照例頒聖之辭。又謂英使司當冬云云，則係誤副使為正使。薛氏當時原不知嘉慶二十一年來華英使為誰，則他人言之而誤記也。

多大的變動，此可於去年十月英保守黨帝國事務委員會所擬的「緬甸藍皮書」中見之，現僅舉其特要諸點，以供關心緬事者參考，（一）規定緬甸復興工作為六年，在這期間，一切事務統由緬甸總督全權指揮，並根據各方政情，於復興後制定憲法交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議決，樹立一自治領地位的政府。（二）國防和外交應由英國和緬政府共同商定，同時應建築海陸空基地，由英帝國政府管理之，（三）利用緬甸復興的良機以合理價格，由非自耕農手中收買田地，並創立一地政銀行，以合作貸款方法貸與自耕農，嚴禁將田地讓與非自耕農，最後一項是解放佃戶的妥善辦法，足供我們借鑑。

★ 三四、四、一。 陶元珍 ★

美國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性質和其意義

赫斯頓著
孫寶毅譯

羅斯福總統指派三個共和黨人，出席舊金山會議，對於共和黨是一隻光澤的紅蘋果，還是一隻熟爛的馬鈴薯，目前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除非該會議所欲商討的國際的和國內的政治問題解決後，才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解答。

但這裏的共和黨領袖已經堅決相信，參加代表團並不給予他們的黨一個難題。他們雖然很勉強地推想參加舊金山會議對於個人的雄志和其前途的關係，但他們不承認總統已經使他們的黨陷於窮地了。

同樣地，這裏社會上亦產生了一種非常有重量的意見，認為羅斯福總統指派三個共和黨人爲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是一個政治的狡計。

其實，在羅斯福總統向國會宣告：舊金山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實具兩黨一體的意義」之前，共和黨領袖早已贊成該黨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的意見，並且亦早已提出以下的口號：「世界和平不是一黨的問題」。

范登堡是參議院的共和黨會議的主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主要份子，可以說是共和黨在外交方面的代言人。他最近主張：在和約之前，立即商訂條約，規定德國和日本永遠解除武裝。

伊登是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可以說是國會與共和黨中的一個有力份子。

史達生是明尼蘇達州的前任州長，他極力主張消滅傳統的

孤立主義。

羅斯福總統指派這三個共和黨人參加美國代表團，有人認爲：他的頭腦中必定有個主意，就是邀請他們參加關於戰後安全計劃的決定，使他們不再振振有詞地起來反對，換句話說，羅斯福把他們的槍口塞住了。用吸收的方法，來平靜反對黨，這種技術在從前並非沒有試過。

再者，范登堡和史達生兩人，可能是一九四八年的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羅斯福總統所實行的計劃和政策，或許是下次競選的主題，不論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是第一位，但是如果范氏和史氏兩人現在就和羅斯福的計劃和政策打成一片，他們的被提名爲總統候選人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史達生說道，被派爲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對他或對任何共和黨人，是一種政治的責任，但他後來沒有強調這種說法，所以有人相信，在他腦中並沒有將來出來做總統的志願。

這裏共和黨的發言人，對於以下的一種思想，力加抨擊，就是認爲選擇舊金山會議代表時應滲入黨派性。他們認爲范登堡等的被選爲代表，並不是完全因爲他們是共和黨人，而是因爲其他的理由，譬如他們的學問，經驗和才幹。他們的參加，可以使舊金山會議所欲解決的問題，更能得到一個聰明的決定。

所以，和代表們十分接近的人士，極力否認羅斯福已經得到代表們的默契。如果他們不贊成羅斯福的計劃和任何協定，

他們在舊金山會議中，仍然可以完全自由地起來反對和批評。這並不是說，共和黨人的參加舊金山會議進進退退好鬥。他們指出，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對於經由國際合作謀得戰後集體安全的基本概念，沒有什麼根本上分歧的地方。

共和黨人說，他們關於這方面的政策，已明白規定於麥金納克憲章 (McKinac Charter)，杜威競選前，且曾無黨領袖們的通過。他們又說，他們的政策比民主黨更顯明，提出亦更早些。

舊金山會議的爭論點的種子，以後或許要發芽生長，因為共和黨主張集體安全可以經由國際合作獲得，不必創立一個國際的國家，共和黨發言人又坦白自認，舊金山會議所欲討論的敦巴頓橡園計劃與共和黨立場之間，有「極大的距離」共和黨的主張，着重於正義，認為正義是和平的先決條件，而敦巴頓橡園的計劃，他們認為着重於武力。

如此看來，羅斯福總統所指派的共和黨代表，或許會起來全部的或局部的反對舊金山會議的任何簽約和宣言。有一位共和黨的發言人曾說過，共和黨代表「忠實的反叛派」，所以當

他們在他們所假定欲去反對的一個黨的新魁領導下的團體中發言時，天生就存在着不同的反對意見。

共和黨很清楚，許多其他國家的代表亦將出席舊金山會議。美國的外交關係繼續於羅斯福總統和民主黨之手，已達十二年之久，所以在許多從外國來的代表們看來，共和黨人似乎是一個生客，甚而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如何消除這種誤解，和如何保持他們在下次登台時的聲望，無疑的是依靠於共和黨代表的努力了。

舊金山會議舉行前，共和黨領袖間曾有所會商，以決定他們的對策。

他們雖然強調他們的代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黨的約束，他們的參加會議，並不作為共和黨的發言人，所以並且擁有委任投票權。

總之，雖然共和黨參加舊金山會議，並不給予共和黨一個聲譽，但共和黨決不猶豫於利用任何機會，以便取得從舊金山會議中所產生的政治資本。民主黨的做法，亦將如此，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譯自紐約時報三月四日)

四川省銀行

資本總額 四萬萬 國幣
 本行宗旨 營業要目

一：發展社會經濟
 二：調濟全川金融
 三：扶持特產運銷
 四：促進生產建設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代理 儲蓄 信託 倉庫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瀘州 宜賓 南充 達縣 雅安 西昌 樂山 瀘定 康定 西康 藏區

重慶 成都 萬縣 瀘州 宜賓 南充 達縣 雅安 西昌 樂山 瀘定 康定 西康 藏區

電報掛號 總行 分行 支行 辦事處
 均為零九六六號

重慶 湖南省銀行

專營 匯兌 業務

匯水低廉

辦理迅速

手續簡單

行處衆多

一點 地 匯 通

湘 贛 浙 粵 桂 黔 各 地
 行 址 打 鋼 街 二 十 八 號
 (電 話 一 四 六 五 八 號)

門市部

專售：餅乾、鮮果、油、糖果、雜貨、雜誌、糖、果、物

輪渡公司 水上餐廳

請坐纜車到

英 美 大 菜
 俄 式 小 吃
 鮮 奶 土 司
 各 種 冷 食
 座 位 舒 適
 風 景 天 然
 全 日 服 務

電 話 四 一 七 〇 二

四明銀行

通匯分支行處

重慶 西安 成都 蘭州 洛陽 寶平 涼州

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理處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整存	零存	活期	定期
----	----	----	----	----	----	----	----

地址：陝西街二二三號
 電話：重慶分行 四一三二號
 電報：三九四一號

總行：重慶黃坡橋上圍四十八號

中國銀行

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
 分支行遍設於國內外各地

收受定期活期存款及各種儲蓄存款

辦理國內外匯兌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代收黃金存款及法幣折合黃金存款

節約建國儲蓄券

鄉鎮公益儲蓄券

創辦人壽保險儲蓄

辦理信託存款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川鹽銀行

鹽業保險部

承續簡捷 各保
 保岸鹽業 賠償低廉
 手續迅速

儲蓄部

基金穩固 手續簡便

營業部

存款利厚 取款便宜
 匯款迅速

山澗 宜賓 南泉

辦事處

成都 萬縣 自流井
 昆明 內江 瀘縣

分行

重慶中正路一三六號
 電話：四二四〇二
 電報掛號：七三八〇

總行

青春素

(命保用藥實) 用男

青春素係自新鮮之動物學丸中用科學方法提煉而成之白色藥片，每片重〇.〇〇公分，含有男性強健素甚豐，凡神經衰弱，陽萎身疲，精神困乏，先後天不足者服之，有返老還童，永保青春之特殊功效。

大成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各均有售
大藥房

肝素

吾人如患貧血，失眠消化不良及神經衰弱等症，設不及早醫治，精神至感痛苦，補救之道，宜服盛名已久之肝素本品係自新鮮肝液中提煉製成黃白色藥片，含有各種維他命活性酵素，肝臟澱粉，少量蛋白質及磷鈣鐵等礦質，功能強身補血開胃健神，老幼咸宜，四季可服。

本刊啟事

本刊第一卷十二期已完全出齊，現已將存餘之少數，裝成合訂本，以便私人或團體收藏，每冊實售法幣五百元，掛號郵費在內，以售完為限，不再重版，幸祈諒察。

民憲半月刊社啟

本刊新訂價目表

定	價		本 刊 零 售 每 冊 國 幣 五 十 元
	時 間	冊 數	
三個月	半年	全年	
六冊	十二冊	二十四冊	
三百元	六百元	一千二百元	

不遇匯兌之處，一元的郵票可以代現。不收寄費，加快或掛號照加。

兒科良藥 福兒片

主治
小兒蛔蟲
積食肚痛
腹瀉便秘
腹脹嘔乳
發熱傷風
出牙等症

經銷簡章郵購辦法函索即寄

捷興藥房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重慶民族路一號

電話掛號一四五六·五五一

和豐銀行

發展工商實業

促進戰時生產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資本雄厚
利息從優
通匯全國
辦事敏捷
各界惠顧
竭誠歡迎

總行：重慶慶林路四七四號
儲蓄部：重慶民族路四九號
電話：一四〇七二號
掛號：一四一四號

民憲半月刊(第二卷二期)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三十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民生公司印刷社

代售處 重慶桂林昆明貴陽等地

各大書店 成都祠堂街

華西書局及其他各書局

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張潤 張君勳 沈鈞儒

李璜 羅隆基 章伯鈞

張中府 梁漱溟 左舜生

虎標永安堂

馳名良藥四種

萬金油	八卦丹	頭痛粉	清快水	各大藥房
搽食兼宜	止渴止咳	頭痛牙痛	祛風降火	均有代售
百病可治	化痰辟疫	一服即止	清腸健胃	

居家旅行

不可不備

重慶製藥廠 廠址：七星崗蓮花池正街十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八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一五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東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九七二號

本期定價國幣五十元